# 天津往事

## ——從北上接收到中共入城

孔令朋

《**天津往事——從北上接收到中共入城**》是以 1997 初版之《風雨人生——巧遇奇遇交織的命運》(香港：天地圖書)第四章《我的官運》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

孔令朋（1919—2002），山東曲阜人，孔子第七十六代嫡系後裔八府长孙。早年燕京大學肄業，武漢大學畢業。中共控制大陸後，留居大陸；「文革」後，曾任上海對外貿易學院教授，中共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94 年移居香港。

## 一場空歡喜 壞事變好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抗戰勝利。前幾天在得知原子彈轟炸日本後，就估計勝利在望，卻也未料到來得如此之快。當天我在家接到路透社名記者趙敏恒的夫人謝蘭郁打來的電話，以激動的口吻告知剛從外電獲悉此訊。這一喜真是喜極欲泣。接着，在中央社工作的燕大同學張振淮也打來報喜電話，緊跟着就聽到外面大放鞭炮歡慶之聲了。

抗戰八年，軍事連連失利，喪地惡耗頻傳，物價高漲，生活艱困，重慶雖在後方，即使在那轟炸最厲害的日子裏，市民飽受折磨，卻也從未失去抗戰必勝的堅强信念。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愛國精神愈戰愈强。我也爲在燕京讀書時所主張的國共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得以實現，深感高興。既有愧於自己對抗戰無所貢獻，又期待着全面勝利早日到來。當時也真不知道必勝的根據是甚麽，其實只是一種願望。

現在，勝利果然到來了，舉國上下，歡欣鼓舞。那天晚上有幾位朋友齊集我家，舉杯同慶，喜笑顏開。飯後在街上參加了狂熱歡慶的自發行列。街上擠滿了人群，由於國人的自持，不見西方街頭那種擁抱接吻，醉酒狂呼的場面，歡樂是發自内心的，人人都能感受到。重慶舞禁開放未久，有了幾家舞場，進去一看盡多美兵。我們興猶未盡，回家來暢談將來，各述胸懷。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將來是個未知數。如今回想那時的激奮心情，實難言語形容。

隨着高興歡欣而來的念頭是，國家勝利了，我自己怎麼辦?

我的工作在糧食部，原來是想以此爲晉身階梯，現在面臨抉擇，跟不跟糧食部回南京去。我在南京讀書六年，並不喜歡這座城市，回南京心有不甘，不回去又將怎樣?

約在八月廿日住在我家樓上的我稱之爲張姨的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專門委員崔唯吾夫人張志安見我整天在家，未去上班，就問：「現在滿街紗帽亂滾，你怎麼不去撿一頂戴戴?」話正問到我心思上。抗戰勝利，百廢待舉，正是千載難逢的绝好機遇。可是，機遇需要自己掌握，稍縱即逝，强求不得，我又能怎樣掌握呢。自忖，我在部裏擔當的是個虛名閒差。平時較少接觸，想來有好事也輪不到我。所以我說：「紗帽再多，我也没有本事去撿，除非從天上掉下來。」這本是一句玩笑話，不料，話後未久紗帽真的從天上掉下來了。

就在這天，我忽接汪君良幫辦打來電話，要我立即到部裏去。我不便問甚麼事，過去我被派去差，有時也是部裏電話找去通知，故而以爲或者又要出差。不料，到部後見到汪君良，他劈頭就問：「天津你去不去？」這太意外了。平津是我渴望而不可及的想去的地方，雖知勝利後定將派人，可是名額有限，逐鹿必多，我未提要求是爲免受拒致辱，怎會主動找我。事出突然，大喜之餘，忙問：「去幹甚麼？」他說：「想派你去當天津特派員辦事處主任秘書。」這更是喜上加喜。此時才想起問特派員是誰。他答以潘鶴。我在外地呈部公文上曾見此名，一直以爲是位四川老頭，一聽是潘鶴，就說：「我不認識，怕合

不上來。」他說：「那不會，他和你一樣來自北平，也是小夥子。」天假機緣，何厚於我，真可謂大喜過望了。

事後方知，這件事的發生真是巧之又巧。原來向各大城市特派員辦事處派人的事，徐堪交給汪君良研究推薦，有的是由特派員自己提名，天津尚無合適人選。汪的辦公室在樓上，這天他到樓下大辦公室來交代公事，在回樓時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天津找誰去呢?」這話正巧被第三科沈科長（忘其名）聽見，我不屬他這一科，此時他不知爲何靈機一動，順口說了句：「小孔不是從那裏來的嗎。」汪君良一拍腦門，高興地說：「怎麼會忘了他呢！」說罷，立刻拿起沈科長桌上的電話機，給我打了個電話，心中作出了決定。

這是影響我其後命運的關鍵大事，時間決定於一刹那，事機出現於一閃念。如果汪君良不是正巧走到沈科長桌邊說那句自說自語的話；如果說的時地不在沈科長身邊；如果沈科長不是事不關己的忽然一轉念想到我；那麼，去天津的人不一定，甚或是肯定不會是我。我的一生就不知將是怎樣另一番景象了。

我受派爲天津待派員辦事處主任秘書，月薪升到薦任三級三百六十元。如非勝利，當然無此機遇。而機遇之來不由自己掌握。

## 夢想成真 重返平津

潘鶴，字異軍，江蘇無錫人，長我五歲，生長於北平，畢業於北平大學工學院，與我兩位堂兄令□【左右各一「生」字】、令秣同學，

和父親也是先後同學。年少翩翩，一旦京話，所以初次見面，晤談十分投機，猶如舊交，相互均慶得人。

派去天津的，除潘、我外，還有會計主任程籤孫，湖南人，過去也不認識潘鶴，由糧食部任命，比我大四歲。

我們受命去天津接收日偽控制有關糧食的敵產，如糧食、麵粉廠，稻穀加工廠、糧食機關等。爲了防止敵產轉移、漏失、隱慝等情事發生，必須盡早到津。可是當時民航尚未恢復，去津須先包機到平。潘鶴和我同去找了已發表天津市市長的張廷諤，要求搭天津市政府包機前往。張以自用不足爲詞婉拒（那時一架客機最多僅坐四五十人），後來幸經部裏幫忙，給我們安排了去南京的機位，祇有先到南京，再設法去津，這太好了，去平津之前可以先去京滬，又是一樁意外的收穫。

我們三人離渝飛京時間較早，約在九月初，僅距日寇投降半月餘。到南京住入中央飯店，舊地重遊，頗多感慨。馬路上見有解除了武裝的日本兵，我們途經日軍兵營，門口已由國軍站崗。坐馬車遊中山陵，玄武湖等名勝，景物依舊，遊人寥寥，市面很不景氣。奇怪的是商店中可購在後方八年難見的美國食品罐頭，種類繁多，價格奇廉。勝利歸來，真是心情振奮，興高采烈。

從南京去天津只能乘美軍飛北平的飛機，他們有任務才開一架，所以必須等待。程籤孫和我取得潘鶴同意乘此空檔去上海看看，保證一接通知，立即回來。潘則留京交涉。

上海不同南京，仍然十里洋場，酒食微逐。燈紅酒緣，熱鬧繁榮。我在南京路上跑了三家旅館，最後還是花了點小費才在東亞找到一間房間住下，據說房間多被包租用作享樂處所。到滬後會見了一些主要親友，久別重逢，盡傾離情，大家充滿勝利的喜悅，但他們也抱怨說這幾天的物價都被重慶來人給炒高了。

的確，政府規定關金券每元兌換中儲劵二百元。這樣，在重慶買一包香煙的錢足夠吃一頓精美的西餐。我買了一些後方難得一見的精美衣物，十分後悔我太老實遵紀了，我本來隨身帶了點關金券，到飛機場得知每人限制帶錢的最高額（數字記不清了），於是在登機前將超額的錢全交給了前來送行的糧食部人員，託他送交我妻。所以我帶的錢只能買些零碎東西和日常使用，而我留下的那些錢所託非人，竟被自己挪用，後經一再催問，等還我時已在半年後早非所值了。聞者無不笑我之傻，當時認真依限帶錢者可能僅我一人。

在上海住了幾天，在親友們的熱情款待下盡情地享受了一番。湊巧我在大世界門前看見國軍到來，市民鼓掌歡呼，而那些官兵坐在卡車上神情木然，毫無反應。我想這使歡迎者定感掃興。這也使我想到八年前我離滬前夕此處落彈遭炸遭成多人死傷的慘劇。

程籛孫住其叔名票程君謀（著名演員程之之父）家，因住所固定，潘鶴電報通知他轉告我，囑立即返京。我們不敢怠慢，當夜起身。不記得爲甚麼我們没有坐卧車或頭二等車，而是擠上三等車。爲此，卻發生了一段插曲。

我們上車後因見車廂滿座，無處安身，只得拿出身份證明和蓋着大印的政府命令，找黑帽子（乘務員）想辦法。他和另一黑帽子商量後，走到中段三個日本車官座前說了幾句話，他們三人立即起身讓我們坐下，並鞠躬致敬，然後對黑帽子說了幾句話。黑帽子翻譯說：「他們說帶有重要物件，可否允許他們坐在通道地上。」我表示許可，他們再度鞠躬致謝，然後坐在所帶箱子上，意甚恭謹。八年來飽受日寇侵略之苦，如今素日蠻橫無理不可一世的日本軍官在我面前俯首貼耳，低三下四，心裏真是痛快，深切感到抗戰勝利的光榮和驕傲。

回京後得知次日下午飛平，因美軍飛機只限軍官乘座，潘鶴已經給我們各弄列一張軍政部發的上校證明，他是少將，已備好軍裝。我離重慶時有位任職美軍的朋友送我一條軍用咔嘰布褲和一件襯衫，到軍衣店買了一副上校肩章和一頂軍帽，配戴起來儼然上校軍官。程籛孫只好買一套偽軍上校軍裝，暫且充數。

美軍飛機是運輸機，没有座位，乘客僅我們三個人，只能席地而坐或坐在木箱上，很不舒服，心裏充滿即可看到久別北平的喜悅。美軍機組一共五人，看見我們的軍階，並且能說英語，顯得十分恭敬，講話時每句後面都加個「是，長官。（YES，SIR）。」

他們是首次飛平，飛臨上空已將薄暮，仍可看見北平景色，頤和園、故宮等神往之地就在身下。由於和機場聯繫未能及時，只得盤旋等待下面準備妥當方能降落，我倒能在上面以興奮心情對北平多看幾眼。降下後，天色已黑，他們都去機場打電話交涉入城的事，只留我一人在跑道上，整條跑道十步一崗，全由日軍持槍守衛。我踏上北平

土地，滿心歡悅，精神振奮。身穿單衣略感寒冷，就在跑道上踱步，初著軍服没有料到經過第一個日軍崗位時，只聽咔嚓一響，原來他收槍併靴敬禮，猛孤丁地嚇我一跳，我不知應否回禮，反正他是敗兵，我没有停步，淺淺頷首示意，也不去刺激他。此後，每遇一個崗位，就照樣來上一次，返回時也是這樣。爲了避免麻煩，我就立在機艙門口等待他們回來。

我自幼仇恨日本，此時揚眉吐氣，仗的是抗戰勝利，而我没有爲抗戰做出甚麼積極貢獻。此時此刻以勝利者身份歸來，歡欣之餘，不免慚愧。

乘車入城，住北京飯店。次晨帶美軍機組人員往遊北海。漪瀾堂茶座傍欄而設，一仍其舊。吃小窩窩頭，豌頭黄，芸豆卷等傳統風味小吃，夙願得償，其樂無窮。我身著美式軍裝，行人投來親切目光，那份高興，真難形容。

李宗仁的北平行轅時已建立。潘鶴曾在李的第五戰區任職，故和行轅参謀長王鴻韶，主任秘書黄雪邨是老友，所以決定留平和行轅多拉些關係。爲了準備接收，由華北食糧公社姓索（忘其名，滿族）的社長來見，詳細介紹天津各日偽糧食機構的情況，主要的有平衡倉庫、食糧公社，東亞麵粉廠等。在平停留三四天，潘鶴要我以主任秘書身份代表特派員先到天津找這些機構瞭解情況，說明政策，做好移交準備。再找適合地點籌設特派員辦事處。等我打好前站，他即來津上任。

我初膺重命，好不恰然自得，滿懷信心地率員赴津。同去的除程籛孫外，在北平找了燕大同學丁秉仁（解放前去台，成爲著名相聲演

員）和潘的妻弟龔德順作爲助手。龔德順後來成爲我的四妹夫。他當時剛從天津工商學院建築系畢業，現爲中國設計大師。（見前章）

此時約在九月中旬，國軍尚未到來，滿街都是美兵，乘吉普，坐三輪，大喊大叫，叫的多是「哈巴，哈巴」，不知何意。有美軍憲兵（M. P.）乘吉普車沿街巡邏，維持秩序。新任天津警察局局長李漢元已經來津，市長張廷諤則尚未到。

天津和北平一樣也是我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別來八年，舊貌依然。急不可待地到處走走，看到那些熟悉的景物不免引起種種昔時的回憶。連當年最吸引我的舊德國中街仍由德人經營的起士林（不是現在同名的那一家），一推門就能聞到的那種誘人香味都絲毫未變。在天津能有上海的享受，而無上海的煩囂。想到我將在此安家太高興了。

## 接而未收 平地風波

一陣重返天津的喜悅過後，趕忙要辦正事。我稍作瞭解立即通知平衡倉庫、華北食糧公社和東亞麵粉廠這三個主要日僞機構，要他們做好準備。他們事先已經得知我來的消息。平衡倉庫管軍糧，食糧公社管民食。所以前者負責人是日本軍官，後者是僞職人員。

我先到平衡倉庫，原負責人換着便裝，約有五六個人，全都表現得誠惶誠恐，十分恭順。只看他們當時神態，真難想像他們以前作爲侵略者曾是如何趾高氣昂，傲慢蠻横地對待國人的殘暴。食糧公社的

僞員，除恭順外還流露出畏懼不安的心情。我囑他們不必擔憂，經過審查，可以留用。

在這兩處我都向他們傳達了將由糧食部特派員前來接收的命令，囑製交代清册，不准任何虛假，接收前負責保管實物，勿使失漏，以備點檢清查。給他們兩天時間趕造表册，我在三天後再來察看。他們都作出绝對服從的保證。

東亞麵粉廠是日資在津經營規模較大的一家工廠，我去後除了傳達命令，囑製表册外，又視察了正在開工的廠房、機器、倉庫等。視察完畢，日人恭送出廠，走到院内見有數十工人排隊等候，當有工人代表來前請我訓話。事出意外，頗受感動。我一站到他們面前，一致鼓掌致敬，情緒相當熱烈。日本人只得陪立旁邊。

我開口先說：「各位鄉親們，我們分别八年了，今天見面大家都非常高興。我不是甚麽訓話，只是和大家談談自己人的話。」接着說：「抗戰勝利了，這八年來，各位辛苦了。政府遠在後方，一天也没有忘記大家。我現在代表政府向各位道乏，奉示慰問。過去你們替日本人幹活，我知道是爲了生活，迫不得已，心裏很不好受。從今以後是爲國家幹活了，這活一定幹得比以前好。東亞麵粉廠將由糧食部天津特派員辦事處接收，我是主任秘書，先代表特派員打個前站，等一切準備就緒，特派員一到就正式接收。在這以前要求大家照常工作，保護好機器財産，防止麵粉流失。我們今後會經常見面的，今天先認識認識。」我又講了些後方抗戰情況，今後接收準備和鼓勵慰勉的話。事後，工人們排隊送我出門，想不到我從此没有再去東亞廠。

我剛出廠門，身後還有很多人。廠門口有個烘山芋攤，飄來一陣香氣。我順口說了句：「好香啊！」。真想買了來吃。後來丁秉仁對我說：「你今天表現很好．人小派頭大。可是那句『好香啊』就露餡了。」

在我辦好這些事後一兩天，正逢九一八紀念，天津街頭突發大規模毆打日本僑民的事件。事態迅速擴大，有些市民凡見日本人不論男女湧上前去拳打腳踢。據說有人把日本女人身後背的嬰兒也搶下來擲地致死。中國人久受壓迫欺凌，仇日入骨，出於氣憤憎恨，有些舉動發洩報復，其心情可以理解。然而這究是非法行動，尤其日軍還未完全放下武器，正在集结待命，如果因此引發意外就麻煩了。我在座車上插了面國旗，免被誤會。

就在此時，接平衡倉庫和東亞麵粉廠的日本人打來電話，告知在目前情況下奉命不准出門，要求將造册限期推遲兩天，我同意了。没有想到這次事件對我們接收工作產生重大影響。事件在下午平息了，造册卻推遲了兩天。

我先來天津是爲了做些聯絡準備的工作，各日偽機構呈繳表册意味着接收開始，茲事體大應由特派員親自主持以作慎重。造册推遲兩天，潘鶴也晚來兩天。就差這兩天使事態發生了急驟難料的變化。

在潘鶴到津的當天清晨，程籛孫等齊集我的住所等待他來。不料，正在此時突接糧食部打來急電，内容令人震驚沮喪，兜頭澆下冰水。電報是件部令，着撤銷天津特派員辦事處建制。改派潘鶴爲駐平津專員，我爲部派駐河北田赋糧食管理處稽核，程籛孫由田糧處另行任命。

丁秉仁、龔德順是潘鶴臨時任用，與部無關，根本未提。這一來讓大家傻了眼，我也懊惱至極，無法理解何以有此亂命。潘鶴乘興而來，一進門得知此訊，未作任何表示，他也猜不透原因何在，只得敗興返平。無奈中囑我留津待命，其餘人隨他去平。

這是爲甚麼？後來聽說是因有人向蔣介石告狀，說糧食部的特派員年齡太輕，少不更事，難當大任。其實指的是早期來滬替徐堪辦私事的上海特派員楊錫志，徐堪也明知蔣介石所指爲誰，然而上海關係他的個人利益，不願變動。爲了應付蔣介石就想到天津，潘鶴和我都比別人年輕，問題既是爲了年輕，正好撤了我們用以報命，實則是遭池魚之災。

我與高采烈，千里迢迢地來天津準備當個接收大員，结果一粒米也没有收到。不論怎樣總以還勝利者的身份風光了幾天，潘鶴身爲特派員連日本人也没有見到，我想想也就心平了。

在當時我的思想上和心理上都認爲接收就是接收，源於勝利。抗戰期間我無甚作爲，此時正好在這方面爲國家利益做些實事。夢想不到後來接收成災，接收大員落到難辨黑白的地步。不料一紙撤令竟在日後幫了我的大忙，保全了我的名譽，證明了我的清白。巧的是全國各部門派往各地的形形色色特派員未待成立機構即被撤銷的僅此一宗，被我碰上。卻在一年後我幾遭傳遍全國不白之冤的危急時刻，憑此電報使我轉危爲安。這是後話了。冥冥中豈真有天意？

# 不管部的糧官

潘鶴和程籛孫等都去了北平，僅留我一人在津。天津特派員辦事處未待建立就被撤銷，河北田賦糧食管理處還没有來，也不知何時可來。我因而就成了當時在津的唯一糧食部的人。既然不再負責接收，日僞糧食機構等待後命，我終日無所事事，每天就和一班新知故友吃喝玩樂，倒也自在消遙。不過前途茫茫，心難自安，唯有得過且過，聽天由命。

天津市市長張廷諤等約在九月下旬才到天津建立了天津市政府。開始召集中央各部在津機構開會，討論與各該部有關事宜。糧食是重點問題之一，機構既無，我就成了未經任命的糧食部代表，得以參加會議，每次會議多由副市長杜建時主持，我在此時認識了他，绝未想到以此爲契機竟爲以後的前途打下了決定性的基礎。

勝利之初，天津先由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軍團入駐，主持日軍受降，遣送日俘等事宜。杜建時則以北寧路護路司令名義負責收編僞軍。國民黨軍隊遲至十月下旬才陸續到達、在天津設立了由第九十四軍軍長牟廷芳任司令的天津警備司令部。軍隊要吃糧只能從日軍留下的糧食裏調撥。糧食既未由糧食部接收，此時暫由天津市政府接管，爲了明確責任，會議決定在河北田糧處未到津前，軍隊需糧由軍政部持派員辦事處主任秘書張仲益代表軍政部調撥；我代表糧食部指定倉庫及品種，作爲今後向糧食部移交的證明；第五兵站總監部的一位李科長負責提運和交付軍隊支領。每次撥糧都由我們三人共同簽字爲憑。

我當時的想法是所有糧食都是日軍留下的，等待河北田糧處來接收，理論上均歸糧食部所有，因此我有權任意支配，卻並無粒米實物在手。抗戰期間，軍隊出生入死，生活艱苦，勝利了應當吃點好的。所以我總是根據軍政部提出的數量指撥庫存大米白麵給兵站去取。以爲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何不皆大歡喜。如此辦理約有兩月，三人合作愉快，工作順利。

十二月間，河北田糧處由保定遷來天津，處長姓吳（忘其名）見我後表面上還算客氣，對接收的事隻字不提，甚至連我初來天津與日偽機構聯繫的經過也置而不問。日偽糧食已由市政府接管。田糧處此時是和市政府打交道，但實物仍然從日偽手中接收。他不問我，我當然不管。只是心想我是部派駐處稽核，與部有關的事理應讓我知道，把我撂在一邊，顯係目中無我。我雖樂得清閒，心裏實感不快。

田糧處的立場和我僅當糧食部代表不同。他們負責際接收之責，對糧食的保管、使用和分配自有打算，而我則是借花獻佛，不必考慮後事。吳處長見我指撥的軍糧都是精細米麵，而且照單全給，很不高興。兩人爲此已生意見。田糧處來後，兵站領糧經常討價還價，不像我那樣痛快，軍方也不高興，每每表示他不如我，因此他對我不滿更甚。我則以部派自居，毫不買賬，既然無事就常去北平。

潘鶴的特派員被撤銷，改派駐平津專員是個只限他個人的虛銜，既無建制，又無經費。北平有特派員，天津有即將遷來的河北田糧處，都不用他管。幸虧他在北平行轅裏人頭熟，給他在中南海北三所撥了一個院落，掛上《糧食部駐平津專員辦事處》的牌子，總算有個落腳

的地方，程籛孫和丁、龔等三人名義上在那裏辦公，還用了一位工友。實則無公可辦，不過維持面子。

潘鶴回北平後，立去重慶活動，尋找出路，一去不返。他一走，我成了頭。主要是没有經費，難以維持，要我設法解決。爲此我去北平兩三次，一則弄錢，二則遊逛。

初到天津，關金券和儲備票的比值尚未確定，暫作一比五。我可以將重慶帶來那點在限額以内的錢暫存中央銀行，抵借儲備票，以備比值確定後再行結算。當時傳言比值可能定爲一比十。如此則現在用掉一半，將來還可補足一半，所以用錢十分爽快，以爲反正還有補數可拿。誰知事與願違，比值最後定爲一比五，這就等於存款全部抵債，幾無所有了。

我將情況打電報告訴潘鶴，要他解決我們幾人在平津的生活問題，他的回答總是説正在設法，要我耐心等待，勉爲其難。於是我只好先找北平特派員高松山问他商借，他推説經費不多，借給我有限的錢，實難爲繼。大家都指望我，我又去找當時在平尚未赴任的遼寧省主席劉多荃，他的夫人與母親姐妹相稱，我稱之姨夫。我既已開口，他就借給我一筆不大不小的錢，説明不必還，這不啻是暗示只此一次，下不爲例。我滿懷喜悦地重返平津，迎頭碰到的卻多逆境。

喜事也有。重慶北平之間雖已恢復民航，但班期不定，購票困難。我亟盼妻子和時僅歲餘的女兒德韞早日前來團聚。我原請潘鶴在回平時將她們帶來，他答以困難。我自己託人在渝設法也無结果。心中焦慮，鞭長莫及，由希望變成了失望。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我在北平住六國飯店，聖誕前夕和朋友們約定晚餐後跳舞。飯前我從外面回飯店換衣服，剛上樓梯，在甬道裏看見龔德順，他劈頭就說：「你太太來了。」我以爲他開玩笑，他鄭重地說：「是真的，剛到。」我進房一看，妻女同在，真是喜出望外。這無異是最好的聖誕禮物。

說來又是巧事。她在重慶到處找人想辦法買機票，都是口惠而實不至，事實上確是非常困難。不料，當天清晨忽接中航機師白君（忘其名）的電話，他曾來我家，但並不太熟，告訴她已聽說她急欲赴平，正巧他在下午首次飛平，如果願意可帶她走。這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喜訊，匆匆收拾，來不及通知我，就飛來了。到後不知我在平在津，由白君陪到公司給龔德順打了電話，才知我住六國飯店。到飯店後茶役在察看和我一起的照片後才肯開門。

復郁初次到平，免不了遊覽應酬。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零時起中國交通由靠左改爲靠右，這是爲了適應美軍習慣。除夕之夜，我夫婦出外慶祝新年。去時車靠左走，歸時已改靠右，是以印象很深。

我在這次來平之前，和吳處長又鬧了一次彆扭，彼此很不愉快。時屆年底，有一天他通知我有事相商。到後方知有一批糧食海運到津，將在塘沽卸艙，要我去塘沽監督下貨存倉。我認爲身居客卿，不管具體業務，何況這個差事異常辛苦，想不到會來找我，以爲故故意爲難，所以不加好氣地問：「這事爲甚麼找我？」他說：「任務重要要找個重要的人去。」我氣憤地說：「再重要也輪不到我吧！」年少氣盛，拂袖而去。爲了避免再多矛盾，又怕他來糾纏，所以去平散心，樂得

清閒。唯一的指望是等待潘鶴歸來。河北田糧處既已到津，也就结束了我那代表糧食部而身無正式任命的不管部生活，爲時不足三個月。

## 難當的主任秘書

一九四六年初潘鶴回到北平，帶來的消息是部裏決定河北田糧處吴處長和青島特派員張進菁對調，田糧處由津還平，潘鶴任副處長，在津設儲運處，派王璘爲處長，我爲主任秘書。我的底薪由三百六十元提至三百八十元，相當於薦任二級。至此，我總算有了固定的工作。

張進菁和王璘都是兵站出身。王璘字玉昆，是河北青縣人。原在湖南洞庭湖一帶任兵站分監，張進菁還是他的屬下。據說他有洞庭王之稱，此來目的有二：一是朋友關係，給張進菁幫忙，一是借此可回老家。

我在北平和張、王見了面，對我十分客氣。我和王璘同回天津，在日本平衡倉庫原址設立了辦公處。我不再擔任部派駐外稽核。

我到天津安家，苦無住處，只得暫住友人家。當時天津租房必須以金條頂租，非我力所能及。雖可設法弄到日本遺留住房，但全是紙門地蓆很不方便。幸經父執張嘏臣（張允宜之父）介紹暫時借住原法界三十一號路的現稱少帥府的張學良舊居樓上，以待找房。數月後再經網球名將林賓華介紹租住他岳母所有的洛陽道住宅，才得安頓下來。兩房條件都很好，得來也可說全靠巧遇，在當時誠非易事。

儲運處的各科室主任等都是王璘從湖南帶來的兵站原班人馬，重要職位僅我一人是外人而居於他們之上，遇事應先向我請示或商量，心裏很不平衡。初時他們自以爲是王璘的人，每想越過我直接找王璘。王總是吩咐先來問我。我見王與我素昧平生，竟對我如此信任尊重，不顧他自己人是否心服，所以我十分感激，決定全力以報。

王璘性格爽直，處事公正。到任未久就推心置腹地對我說，他此來非爲當官，只是短期幫忙，但求不要出事，他帶了一些錢來，可供補貼，希望我能把好關，嚴禁弊端。對我绝對信任，一切放手去幹，能做決定就自做決定，責任由他承擔。他帶來的那些人都追隨已久不便捨棄，但他可充分控制，不讓他們與我爲難。我還能說甚麼呢。

儲運處是受命於河北田糧處的業務機關，職司軍糧的購儲供應，與兵站對口，下轄幾個倉庫和工廠。倉庫最大的是軍糧城，工廠是東亞麵粉廠，經營實物，易生弊端。我既受排擠，怕上當受骗，引火燒身。王璘有話，至少可免上下夾擊，集中全力慎審把關就行了。爲了工作方便，潘鶴又在北平兵站總監部给我弄了個上校預備員的空街，可以穿軍裝，算是兵站的自己人，說話方便些。

我徵得王璘同意，定下幾項辦法，如購糧必須招商比價按質驗貨；出售日本遺糧必須會同市政府和敵偽產業處理局公開招標，現場查估數量；各倉庫和工廠按期呈報糧食進出存儲數量等。由於兵站負責人仍是年前和我合作撥糧的那位李科長，東亞麵粉廠廠長張乃惇雖爲初識，私交甚好，所以我經常問他們收糧的品質是否符合要求，借以對

下面購糧交糧的情況有所瞭解，如果他們說行，即使出現問題，我已盡責，經手人也不得不有所警惕。

我的這種態度和做法雖然不一定能夠盡除流弊，至少可以稍事限制，不至胡作非爲。各组室值此良機，不得其便，而我有權在手，難以逾越，對我不能不表面敷衍，形成貌合心離之勢。有幾次我批駁了認爲不妥的購售業務，鋒芒過露，引人忌恨。例如，有一次我發現倉儲组報上來準備出售一批存糧給一個非糧店的個人，認爲不符規定，批駁不准。該組組長來告訴我此人是張進菁的乾爹，要我網開一面。我一聽更火了，說：「我訂的辦法都是張處長批准的，既不符合規定，要准他准，我不准。」我立即問王璘怎麼辦。王璘只好說照章辦事，把這事壓下來。事後聽說他們另外換了個名義，還是把這批糧賣給他了。我徒然得罪了不少人。

一九四六年八月間，監察院組成「接收清查團」到各主要省市進行清查接收敵僞產業情況。勝利後，國民黨的接收被稱爲「劫收」，五子登科即票子、車子、女子、金子、房子，成爲十分普遍的現象。群魔亂舞，各顯其能。弄得人民憤恨，輿論大嘩。此舉旨在安撫人心。天津是清查重點之一，團長由河北監察使李嗣聰擔任，另有監察委員數人擔任團員。到津次日，我幾被冤成首犯，幸後經澄清（見下節）。在過程中由團員監察院委員白瑞爲我平冤，對我產生好感。儲運處正好由他來查，事先對情況已由我簡要匯報，有所瞭解。他來時事先不作通知，來後直接找我。我很怕出事，那些組室主任平時計謀多端，遇此陣仗很可能沉不住氣。我利用白瑞對我的印象，請他坐在我的辦

公室內，要甚麼材料由我以電話通知各有關負責人拿來給我，由我向他解釋。只看賬册表報當然看不出甚麼問題，加上我心中無鬼，應付坦然，態度自如，並積極向他提供線索，得其信任。最後說了句：「這裏由你主持，我放心了。」甚至連王璘都没有召見。

事後，各主要業務科室主任和倉庫主任都來謝我，知道是我替他們擋了駕，解了圍，否則不定出點甚麼事，誰都受不了。

天津糧食待派員既未成立，日偽糧食先由天津黨政接收委員會暫時接管，市長張廷諤任主任，國民黨天津市黨部主任委員爲副主任。河北田糧處到後正式接收，現又轉交儲運處，先後三易其手。我初到津時曾去兩處露天倉庫察看，只見各種雜糧露天堆放，其中很多是日本供民食六穀粉用的原料，如稗子等，不堪食用，卻載在糧册。有些玉米、高粱、小米等則堆積如山，無法計數。我去時又親見駐守美軍爲清除場地用推土機將糧垛剷平，難以核對。只有米麵存放室內，曾由我指撥一部充作軍糧，餘應可查。在這些過程中，流弊難免，誰負其責。出了問題難以講清。我雖預有防範，也很難保人人清白。所以清查團前來清查，順利過關，他們很表感謝，想不到平時對我不和，在關鍵時刻替他們維持做主，因此其後對我的態度有所緩和。可是，我畢竟孤掌難鳴，依靠的只是王璘的支持，加上糧官名聲不好，被認爲是個大染缸，我既不圖利，何必背此惡名，所以幹得很不順心。

清查團走後約兩個月，我感到下面組室故態復萌。有一次，王璘返鄉，離津十天，由我代理處長。平時，王璘每晨召開各負責人碰頭會，有事匯報，共同商議，做出決定，由我執行。不論是他或會議作

出的決定，我執行起來多有依據。主要責任由王璘承擔。他此時一走，各組室那班人認爲良機難再，故意找些難題，與我作對，也許是乘王璘不在，想看我的笑話，給我的感覺是大有逼宫之勢。我氣急時說：「你們都是獵人，我並不是兔子，急了會成老虎，没準吃人。」這等於撕破了臉，使我更是不安其位，欲思他就，苦無出路，那些時十分煩惱。但，天無绝人之路，不久後機遇又來了。再一次可說是機由天降。

## 壞事變成了好事

日本，在我青少年時是個人人憎恨的名詞，誰不恨日本，愧做中國人。我在抗戰勝利後重返平津，振奮無已地認爲可乘接收之機把日本人横徵暴斂掠奪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還歸國有。我便可以勝利者的身份讓日本人在我面前俯首貼耳地恭謹聽命。初到天津已經多少有了一些令人喜悦的經驗。一紙撤令無異是意外地破壞了我的勝利之夢。當時的喪氣誰知後來竟成福氣。

向戰敗的侵略者接收本來應是光榮的使命，誰知歷時未久竟鬧得群醜飛舞，民怨鼎沸。我幸未插手其中。客觀地說，並不能講凡來接收必有貪掠，可是害群之馬絕非三匹五匹。糧食更易成爲衆目睽睽，人心所繫。我任儲運處主任秘書時所屬倉庫的糧食已由河北田糧處接自天津黨政接收委員會，辦好了移交手續。所以有弊也好，無弊也好，與我無關。我任職後從未想到會爲此事在我身上發生甚麼問題。在那

段期間，外間曾有傳聞，日人尚未交出的糧倉曾被劫收。前門關閉，後門開敞。我也姑妄聽之。

一九四六年八月天津敵偽產業接收清查團到津的第二天傍晚，我已下班回家，忽接市政府主任秘書王余杞電話，請我立去市府有要事急待面商。我想不出有甚麼會有如此緊急，到後方知果外禍起蕭牆，變生肘腋。

我一到，王余杞面色沉重地問我，我初來時曾否接收過糧食。我不知其意，據實以告。他才告我，因曾聞自杜建時，我没有接收日偽糧食，所以才急於找我。由於清查團在當天下午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由該團劉秘書長（忘其名）鄭重宣佈，已經查明天津日偽糧食是由糧食部來的孔令朋最早接收，應負全責云云。這是天津市民人人關注的大新聞，明日即將發表於全市各報。甚至廣傳全國。在他得知我手中存有當時撤銷特派員辦事處部令電報和往來文件後，稍覺安心，囑我立即持件往見該團負責此事的白瑞委員和劉秘書長說明事實，消除誤會。同時由他分別通知各報，暫緩發佈報道，以免誤傳。

此訊來之突然，既驚又氣，我趕緊回家找齊所有可供證明我未染指接收的文件，到清查團駐地找到白瑞委員，他是個公正爽直的老者，在看完文件後，對我說：「這些電報是你的寶貝，幸虧還在你手，否則必將鑄成大錯。」要我趕快去找劉秘書長說明原委，採取補救措施。

劉秘書長態度傲慢，迴異白瑞。他聽了看了之後，只是淡淡一笑地說：「我們來後查報到紀錄，你是最早來接收糧食的部派人員，不知後來撤銷的事，所以以爲是你. 就向報界公佈了。既不是你，就没

事了。」我心想如此大事，何至如此草率。憋着氣問他明天發表新聞影響太大，能否阻止。他毫不在乎地說：「已經來不及了。既不是你，頂多將來再說清楚吧！」我知他不肯認錯，不惜以我爲犧牲，一經見報，誰信其無，恐怕永難洗清了。當時内心焦急，非可言喻。

回到市府，王余杞等我未走，告訴我已分别通知今天參加招待會的各報記者和编輯，說明事實，力陳利害，幸均獲同意暫不發表。王余杞和我並不太熟，幫了這個大忙，實至感激。也幸虧他事先聽聞，知我無辜。

第二天，遍查各報，只有一家報紙上說：據云糧食聞由某部某秘書接收，有待續查。没有點名，誠屬大幸。

事後想來，如果當初我真的着手接收，雖爲特派員辦事處名義，但人手不足. 糧食遍地，怎能保不漏失，此時清查。難卸其責。所以當年撤令，實爲福音。原始證件如果不在我手. 急切間也難以證我清白。這真是壞事變了好事。

全國接收出了不少問題，我的遭遇，當爲孤例。三個月後，我即離此是非之地。

## 天津市政府的「太上科長」

糧官是個是非之職，我任天津儲運處主任秘書不及一年，其中况味實難盡述。我既無意混水摸魚，内心時萌去志。但在官迷心態下，

欲在天津一隅之地，找個相當於主任秘書的職位，如無淵源，談何容易。所以雖有去志，卻無出路，只有等待機會。機會又在哪裏？誰知機會不找自來，給我機會的是杜建時。

杜建時是天津附近楊村人，長我十二歲。他曾奉派留学于美国军事學院，返國後主持國防研究院，任蔣介石侍從室中將參軍，替蔣介石聯繫在二戰期間美國派來中國的魏德邁，史迪威等戰區參謀長，深得蔣的信任。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親派杜建時任天津市副市長兼北寧路護路司令，和市長張廷諤等同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底來津，當時我已先在，只聞其名，不識其人。

前已述及，勝利初期中央各部和其他機構各有特派員辦事處之類設在天津辦理有關接收等事宜。天津市政府建立後自有很多工作需要協調，於是不定期地邀請中央駐津人員開會進行研究商討，會議由杜建時以副市長身份主持，我初識杜建時即在會中，未經任何正式介紹。民以食爲天，那時的天津處於解放區包圍之中，平津之間雖鐵路尚通，而夜間時遭破壞，往往隨壞隨修，所以糧源緊張，民食供應諸多困難。糧食部天津特派員辦事處未建先撤，我獨留天津，得以糧食部代表身份應邀出席。

我初見杜建時的印象是年青爽直，具軍人風度而少官習。在第一次會議上他對增强天津糧源提出了在北寧路沿站設點派員收購，集中運津等意見。我一聽認爲不可，自持來自中央，無所顧忌，立即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以安全爲理由，逐點提出不可的原因，建議鼓勵糧商

自購自運，而由政府負責鐵路水陸交通的暢通，不限制糧商的合理利潤。同時可以防止派員收購容易引起的弊端。杜建時聽後不僅没有不高興，反而深表讚許。在我發言前他根本不知道我是何許人也。

這樣的會開過大約三次，每次我都坦述己見，不僅限於糧食，對其他工作亦然，尤其着重接收防弊等方面。杜建時每次都找我主動談話，彼此互有好感。後來得知在這幾次會議中使他對我留下良好的印象。

我在儲運處任職期間，爲了處理日偽遺留糧食曾在處裏邀請市政府和敵偽產業處理局開會研討。杜建時親來參加，和我有了面對面的接觸。潘鶴每次來津，王璘設宴款待也都請杜建時參加，借以加强與市府的聯繫，三人之間逐漸建立了私交。

有一次正在觥籌交錯之際，杜建時對潘鶴和王璘說：「令朋這位小老弟，將來有機會時我要請他幫忙，你們肯不肯放？」王璘說：「我來天津原來講好是暫時的，平時有賴令朋幫忙，可是限制了他的前途。你能栽培提拔，給他發展的機會，我正求之不得，豈有不放之理。」潘鶴表也示了同意和感謝。杜建時又補了一句：「那好，到時候我要人你們不能不放。」潘、王給以肯定答覆，於是在歡笑中講明一言爲定。我心中暗喜，不好表示求去之意，對此存有希望。何時實現，茫然無知。

一九四六年十月底某晨閱報得知杜建時升任天津市市長，同時發表的還有北平市市長何思源。我想等待以久的機會來了，杜建時既有前言應可實践。可是我和他萍水相逢，毫無淵源，對他能指望甚麼呢？

最初的反應是找他給我安排個秘書，專員之類的閒官做，離開儲運處再說。絕想不到的是消息見報當天下午，市府秘書長梁子青忽來我處拜晤，以前我只在公衆場合見過他。

梁子青見我就說：「今天任命一發表，杜市長第一件事就是要我來找你去給他幫忙，說你們有約在先。」這實在太出意外了。杜找我可以想像，但何至來得如此之快。高興之餘，我問：「我能去幫甚麼忙呢？」，梁說：「杜市長想請你擔任第二科科長。不過考慮到你現在是主任秘書、去當科長，怕你屈就，請你諒解。」我說：「最好先當個秘書之類的閒差，熟悉一下市府的工作，其他以後再說。」梁說：「如果當閒差，杜市長就不會那麼急地找你了。」我見情意懇切，不便推辭，雖對這個職務毫無把握，還是答應下來。我和杜建時萍水相逢，相知尚淺，他能给我以如此重視和信任，使我頗生士逢知已之感。

第二天杜建時就親來儲運處和王璘商定在他就任市長後一個月即十二月一日我再去市府任職，以便我留下來清理手中工作。杜、王和我都很高興。

十一月卅日晨儲運處爲我舉行隆重歡送會，巧的是就在這天半夜裏我的長子德予出生。一天裏出任新職和喜得麟兒可稱雙慶。

十二月一日我去市府報到，杜建時表示歡迎，他說：「原來想請你來當第二科科長，現在決定你幹第三科。因爲這是市府裏最重要的一個科。」說實在的，我對此項工作很不瞭解，生怕他對我期望過殷，幹不好，有負重託。爲此，我表示了憂慮。再次提出是不是讓我對市府工作先熟悉熟悉，然後再任實職。他說：「請你來是借重你和我一

起爲天津老百姓多做些事，你儘管大膽放手去幹，一切由我負責。」說到這樣，我還能說甚麼呢。

自這天起，我的前途和命運起了決定性的變化，等於開始了新的生活，置身於新的環境。底薪提至四百元，已是薦任一級了。是年杜建時未滿四十，我則二十七歲。

我轉職市府是一次機遇，機遇之來並未由我掌握。其起因竟是我在初識杜建時時向他提出了不同意他的意見的意見，由此而獲知遇，豈非異數。

## 爲甚麼我被稱爲「太上科長」

國民政府統治時代，天津、上海、北平同爲特別市，與省平行。市政府的編制相當簡單，全府人員約僅二百。除市長外，另設副市長、秘書長、主任秘書各一人。參事四人，相當局長級別，可以互調；秘書長下轄四個主管科，第一科主管人事、组織、文書等，第二科主管地政，財政兩局，第三科主管社會、警察、民政三局和外事處，第四科主管教育、公用、工務三局。其餘還有秘書室、參議室、專員室、會計處、總務科、交際科等。各局另有各自的编制。

我來市府前原以爲將任第二科科長，曾找了些有關財政的資料看，今改第三科對主管業務相當生疏，只有硬着頭皮應承下來。

杜建時是軍人出身，沒有擔任過獨當一面的行政工作，缺少一套自己的班底。我被看中重用這是主要原因之一。他到任後市府人事更換不多，各局長亦多連任。在新任人員中我的責任最重，而我和他原無淵源，所以很被各方注意。

我所主管的三個局，社會局管工商、糧食、勞工、宣傳、社會團體等；警察局管治安、交通、警政、外僑等；民政局管户政、宗教、選舉等。十個區政府屬之。外事處專司涉外事務。所以比較起來，第三科的任務繁重，工作量大，收發文件佔全府半數以上。四位科長僅我爲新手。

第三科下設兩股，股長都是三朝歷任的老公事，年齡長我二十幾歲，見我初來又很年青，習慣地要惦惦我的分量。我就任後最初幾天，他們經常拿一兩件各局請示呈文，貌似恭謙地故意問我如何處理，我知道這是考我，爲了怕出錯受欺，我對沒有把握的事多是反問：「你看應該怎麼辦？」「以前是怎麼辦的？」或囑調出有關檔卷供我參考，再作決定。好在我對批件、改稿、擬文、簽呈等公文程序還能應付，幾次以後，他們就不來麻煩了，過了一關。

我的責任是承上啟下，各局處報告及請示等呈文上來後，先由我擬具意見，簽請秘書長轉呈市長批可、修改或增删。我所提意見绝大多數爲杜建時所接受。我有時修改或批駁了呈文所請，總是提出理由或根據，基本上杜建時均予同意。所以我放手任事，心情愉快。幾個局處中以社會局主管的事多而複雜，局府立場不同，意見時或相左。社會局長胡夢華是國民黨黨務出身，資格較老，中央任命，有幾次爲

辦某事，他繞過我直接去找杜建時，杜總是說：「你先和孔科長談訣，商量看着辦罷。」爲此胡對我漸生不滿，曾對別人說我是太上科長，爲我所知。其後有人開玩笑似地對我說：「這事得先請示你這『太上科長』。」十分明顯這並非對我的恭維，而是心有不服的表現。我聽了很不舒服，只得盡量避免得罪他們。幸好在我任職期間未曾和哪位局處長發生正面衝突。胡夢華對我也只是暗中較勁。

我初入社會，少不更事，有幸得過王璘和杜建時這兩位充分信任我，支持我的長官。才不致孳生麻煩或事端。

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八月我任天津市政府第三科科長年餘，其後半年是兼任，除處理日常事務外可記之事不少，在全市所司範圍内發生的大小諸事多有所知，開闊眼界，頗饒興趣。兹姑舉較爲重要者數事，簡述如下：

一九四七年春，天津金鈔買賣，糧紗投機之風頗盛，引起物價波動。杜建時想加以管制，要我擬一個管裁辦法。那時全國尚無先例，我只好主觀想像，閉門造車地草擬了一個禁止金鈔買賣，限制糧布交易，加强管制市場的緊急措施。杜建時閱後十分滿意，在找社會局、警察局等有關部門研究後，略加修改，一面呈報行政院，一面召開會議，於二月初公佈實施。

開始之日，杜建時等親臨有關交易所及市場等處突擊檢查，强制執行。事屬初創，商人不明表裹，慑於威勢，稍加收斂，停止公開交易，取得一時效果。趁熱打鐵，上報中央。其後，行政院也頒佈了類

似的經濟金融緊急措施，內容大致與天津相似，據說即以天津經驗爲藍本。這使我大爲得意。

未久，行政院明令嘉獎了杜建時和我。當時，科長能得院令嘉獎者绝無僅有，十分罕見。我自鳴非凡，暗慶爲日後向上爬打下了基礎。杜建時高興之餘，更增强了對我的依賴和信任。

可是，好景不長。物價持續上漲，市場依然混亂。病入膏肓，治標不能治本。但那是後話了。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天津南開、北洋等校學生響應風起雲湧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貪污」的學生運動，上街遊行，數約六七百人。與此同時三青團也組織了部分學生上街抵制遊行。兩隊相遇於美琪電影院門前，相對指責，發生衝突。警察干涉無效，雙方均有受傷。有幾位學生被帶入警局，引起北洋學生續往市府請願，由杜建時接見，答應了立即釋放帶局學生等要求，在溫語安撫下，學生表示滿意而去，以爲没有事了。

在遊行衝突中，受傷者僅爲北洋大學學生，兩日後學生派來三位代表到市府請見杜市長。杜建時要我代表他全權接待談判。我覺得學生屬教育局應由第四科管，而且此事難辦，所以託詞建議請第四科李科長出面。杜說：「我考慮過了，你年輕，和他們容易說話。」我問如何掌握。他說：「你看情況，能答應的就答應，你有全權。不能答應的就先解釋清楚，另再研究。」我只好應允，臨去時他又吩咐我必須和顏悦色，表示同情，不要硬頂，避免碰僵，免得不好收拾。

我到會客室，見有學生代表二男一女，就先自我介紹，答覆了他們我是否有代表市長的全權的詢問，爲了不致引起誤會，没有問他們的姓名。看情況以那位女同學爲首，話由她說。

他們提出四個條件：一、杜市長來校向全體學生道歉。二、賠償被損壞的校旗和私人物品等。三、嚴懲兇手。四、保證不再發生同樣事件。

我先表明自己也曾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瞭解青年心理，同情愛國行動，所以我們不是對手，而是共同研究如何解決問題。然後逐條討論，我解釋，她反駁。整個下午談到以下程度。一、天津出了此事，杜市長也很難過，願去校慰問。二、一切損失公私物品開來清單，照單償賠。三、令警察局調查事件經過，雙方都有傷者，誰打人誰負責。四、市府事先已令警察徒手維持秩序，不料仍生事端。如今後不再發生上街遊行等事端，市府保證不再發生同樣事件。

我既代表杜市長，且知他是代人受過，當然盡力爲他開脱。明知這是三青團指使，也不便明說。談話時氣氛輕鬆溫和，辯駁時雙方態度良好。但當天未得最後结果，約定明日續談。

我在向杜建時報告後，他表示滿意，同意去北洋看望學生，慰問傷者。他認爲條件不太苛刻，囑我再談時對無法接受的耐心講明道理，爭取諒解，剛柔相濟，妥爲應付。

第二天幾乎談了一整天，中午時他們拒吃市府準備的點心，我也奉陪不吃。他們客氣地請我休息後再來，我也表示他們如不休息。我不休息，借此博取好感。

談話時間拉長是因他們在昨日所提條件基礎上又增加了新的要求。例如：校旗要由杜市長親送，面交校長，並向學生們公開公道歉，沿途由軍樂隊護送，保證查明兇手等。我同意校旗由杜市長親送到校，並向學生講話表示遺憾和歉意。但同學們應當理解，這是因爲事情發生在天津，市長也是代人受過。軍樂隊送旗必會引起市民的議論，並不一定對學生有利，爲免節外生枝，似無必要。代表們最後表示同意。對開來損失清單如油印機、自行車、鋼筆、眼鏡等全部賠償。至於懲辦兇手，警察局正在調查，一有结果，立即通知。同學如知是誰也可提出名單，協助調查。其實這是推託。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應由雙方互保。談來談去，不了了之。

不料，談完後那位女代表又笑着對我說：「還有一個條件，請派飛機向國民黨軍隊散發傳單，勸告不打内戰。」這個要求出我意外，當時表示市府無權調派飛機，也無權制止内戰。鑒於打仗是雙方的事，所以如果散發傳單應勸告雙方停戰，並向雙方散發。如有可能請學生派出代表参加。對此互相表示了希望停止内戰的立場，未得结果也就算了。自始至終都没有出現激烈的言詞和表現。

轉過一天，杜建時就由我陪同帶了新製校旗去北洋大學，面交校長，並未打開。召集了部分學生講了幾分鐘的話，爲在天津發生這件事深表遺憾和抱歉，望今後安心學業，報效國家等。學生未作任何不

利反應，使他放下心來。隨後去宿舍慰問受傷學生，有一位躺在病床上的學生說：「政府太狠心了。」給我印象很深。杜建時未作答覆，只握了握學生的手。此時此地他又能說甚麼呢。

一九四七年間天津國民黨市黨部改组，新來的主任委員邵華是潘鶴老友，和我也熟。一天，杜建時找我去，梁子青在旁，他很輕鬆地說：「令朋，市黨部改组，你代表市府去當一名委員。」此事似已定局。我一聽就笑了，說：「我不是黨員。」這個回答使他大出意外，連問：「你怎麼會不是黨員？」我說：「我没有參加過。」他忙對梁子青說：「趕緊给他辦入黨手續罷。」梁子青面有難色地說：「那不行，剛入黨不能就當市黨部委員。」看來，他倆已商量好，不料未經調查，主觀地以爲我是黨員。

我當時的確覺得失去一次機會，相當可惜。否則具有雙重身份，堪爲進身階梯。不過我知道市府和市黨部正鬧矛盾，置身其中難免是非，所以不去也罷。

我没有參加國民黨並不是不想參加或對國民黨有甚麼不滿看法。我當的是國民黨政府的官，不參加並没有影響我的職位，也就聽其自然了。

還是在武漢大學四年級時，有一天同班陳守謙興衝衝地來告訴我，昨天由他提名。我當選爲武大國民黨支部委員，法學院長楊端六是主任。這太奇怪，也太有趣了。我不是黨員，也没有出席支部會，怎會選上當委員。陳守謙很着急，名是他提的，提了個非黨員，太失面子，所以拉着我去照像，然後填表入黨。我不願太拂其意，就跟他去照了

像，但卻强調我要入黨就當個特別黨員。因爲國民黨規定由兩位中央委員介紹即可當特別黨員，我想特別黨員總特別些，我既有條件，不願在學校入黨，等到重慶再說。入黨之議因而作罷。

我因不願去中央政治學校受訓半年，未能進入外交部。如去，也入了黨。

再有，是進糧食部時，財務司洪其琛科長以爲我是黨員，要我登記。知我不是黨員，曾要我填表申請。我也是說想當特別黨員，他未再逼我。否則，也入黨了。

當特別黨員是我當時的真實思想，既無入黨的绝對必要，我也没有積極進行。後來，我的官位日高，就連特別黨員也不想當了，一心想有一定資歷時爭取當社會賢達，那就更易進身晉階了。

如今回想，不免後怕。幾次入黨未成，都是陰錯陽差，想攀高枝所致。也許是命該如此。否則，我一定會在一九四七年成爲天津市黨部委員，那麼在解放後我的命運肯定不同於現在了。未遂特別黨員的願望竟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日本投降後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軍團搶先進駐天津，並擔任天津地區受降事宜，直至一九四七年才陸續撤離。在此期間這些美國大兵經常酗酒鬧事，胡作非爲，雖有美軍憲兵巡視，亦莫能制。凡有擾亂治安，涉及市民等事都由警察局負責處理和交涉，一般不向市府請示，只須報請備案。每見這種呈文我只是寫上「擬存」，由秘書長批存了事。

記憶中至少有兩件案子是由我提出意見，以府令着警察局認真調杳一，再作處理。

①、警局報稱在一個美軍倉庫內有中國小工偷了一木箱鐵釘，被美兵發現，喝止不聽，反而攜贓狂奔，致遭槍殺。美軍以私入庫房，盜竊軍用物資逃走時拒捕被殺结案。我閱卷後感到疑點很多，小工縱竊鐵釘，箱重只能肩扛，何能聞喝扛箱狂奔。既被發現，身在庫內，到處有美軍看守，無法逃走，絕無非開槍射殺不可之理。何況照片顯示，箱破釘散即在屍身附近。說明是肩扛時被殺，手擒即可，何必槍殺。

②、警局報稱有一張姓吧女投訴，随一美兵進軍營後，在一間空屋內被五名美兵分執手足，玩弄輪姦，抗拒被傷，要求賠償不允，被趕出營外，故而呼冤。警局認爲吧女賣淫身入軍營，一切自願，美兵既付報酬，不應另索賠償。只作爲一般糾紛事件報備。我閱卷認爲吧女賣淫並不等於可被任意凌辱輪姦,尤其美兵玩弄中國婦女手段殘暴,行爲異常。吧女抗拒受傷應交涉賠償。

以上兩案後經警察局據理力爭，卒獲賠償。但對這些事件爲避免引起市民不满，釀成事端，故均密而不宣。

如今想來，單憑一條濠溝，幾座碉堡就能保衛天津，不啻是個不切實際的空想。但在當時這被視爲十分重要的頭等大事。

一九四七年春,在第十一戰區副長官上官雲相的主持下成立了「天津城防構築委員會。」，由杜建時和天津警備司令部積極籌築天津城

防工事。計劃圍繞天津挖一條寬十米，深三米，全長約四十幾公里的護城河，上築土牆，犬牙交錯地構築大小碉堡千餘座。用防解放軍攻城，作固守之備。下設工程、財務、監察三個委員會，指定我兼財務委員會秘書，協助中國銀行副理潘述庵統籌向各方面募款事宜。說是募款，實是攤派。主要對象是各銀行，各大工商企業和各富紳等。開過幾次會，每次都由杜建時講話以保護天津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爲理由，號召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由我報告募款進展情況。被攤派的對象無法也不能表示反對，只有被迫拿錢，所以款項不久就籌集到位交存中國銀行，由潘述庵負責支付。工程進行相當順利，不到年底基本完工。我在籌款完成後就不再從事有關城防的工作。有了城防工事給進出天津增加很多不便，卻未對守衛城池起到任何重要作用。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解放軍在正式發動總攻後兩天，天津就被解放了。

## 一年三升 少年得志

一九四八年二月初，天津市政府奉行政院令去南京參加五大都市糧食配售會議。我隨杜建時和社會局局長胡夢華及外事處處長李大爲同去。北平市市長何思源和社會局局長溫崇信等同機前往。乘中航包機，於會前一日由北平啟程。不料飛至中途，南京氣候不佳不能降落。機長來問是飛回北平或暫飛青島。我一聽立向杜建時建議飛青過夜，因我家在青可以回去探望父母。杜同意了，於是改飛青島降落。

我們來得突然，青島市未及接待，時值冬季，迎賓館内無火，我乃電告父親派車接杜建時和何思源到我家居住，其餘衆人都安排住在父親任經理的中國實業銀行。何思源是父親故交，杜則初識，與父交談得十分投契。我得到一次意外的省親機會，雖僅一夜，全家皆大歡喜。事後，杜建時告我，此次去青對我更加瞭解，增强信任，慶幸我有這樣好的父母和家庭。這次飛機改程，也可算是件巧事。

次晨飛京，趕到糧食部會場時會議已經開始。會議由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主任繆雲台主持。除糧食部、中央銀行、中央信託局業等主管和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廣州五大都市市長等參加外，陳立夫、吳鐵城、王雲五、董顯光等中央政要也來與會，説明會議很被重視。

會期兩天，會議決定自三月份起在五市試行配售糧食，南米北麵。凡常住户口每人每月憑證可購配種十五市斤，不論年齡、性别、職業，包括外僑在内。所需糧食由美援和政府各半，按月輪流供應。配價每月月初在各市分别議定，以上月平均糧價爲根據，可以略低，不能過低，政府撥槿收回的價款須作繼續購糧之用，款少則將難以爲繼。美援部分收回的價款依據計劃用於救濟福利或建設事業。在五市各設民食調配委員會，屬行政院管轄，其下可設民食調配處。有關组織細則和具體配售辦法，由各市根據會議決定的原則自行制訂。這無疑對正患缺糧的天津是個天大喜訊。

會後我陪杜建時同去上海，住了兩天。我在樂意飯店接受記者採訪，發佈了天津即將配糧的消息。在滬期間，杜建時告訴我準備成立

天津市民食調配處，由胡夢華兼任處長、我兼任副處長，業務由我負責辦理。我暫時仍任市府科長，因調配處屬行政院，我如離職則與市府脱離了關係。他請我先設想一套切實可行的配售辦法，既防止弊端，又提高效率。另再替他寫一篇告市民書，最好一回天津立即發表。

這次在上海，由糧食部我原來的上司汪君良司長主持召開了一次包括榮毅仁在內各上海麵粉巨頭的小型會議，商談上海運粉去津的事宜。初步有了南糧北運的打算，其後的運作對解決平津糧源困難起了重要作用。

由於五市將有競爭，中美雙方根據配售開展情況評定優劣，執行不力，成績不佳，隨時可以停止配售，所以任務繁重。我希望爭拔頭籌，指導思想是辦法既不同於他市，又要嚴防弊端，博得美方好感。至於告市民書，我在受命後隨時都在思索，打成腹稿，於返津後花了一天一夜功夫寫了篇六七千字的文字，以杜建時名義發表於天津各報，分三天刊完。主要內容是說明會議過程，配售原則，糧食來源，售款用途及南糧北運，經濟措施等，借以宣揚中央德意. 安撫天津民心。

民食配售事屬創舉，在中國無例可循，辦理好壞與一百八十萬天津市民之生活與人心息息相關，對我來說既是爭取表現的機遇，又是責任艱巨的考驗。我決心竭盡全力，出人頭地。

一九四八年三月初，天津成立民食調配委員會，杜建時任主任委員，下設天津民食調配處，胡夢華兼處長，我兼副處長。直屬行政院，但是個業務機構。

事先，我在杜建時正式向我提起此項任命時，我考慮到年事尚輕，重名輕利，配售工作與天津市民關係密切，必受廣泛注意，我绝對不想染指分文，更不願不吃羊肉，代人受過，所以當即提出兩個條件：①、調配處必須一不管糧，二不管錢；②、人事我不管，業務有全權。杜建時深知我意，表示接受。我乃對他講了我以防弊爲主採取措施的一些設想，並且說明理由，得其讚許，囑我擬出具體辦法，以便提請民食調配委員會討論通過。

當時糧源緊缺，糧價騰貴，一兩黄金大約可購麵粉十袋。我一心圖名，爭取良績。自己既不想沾光，更必須防别人謀利。而且全處人員編制約三百餘人，包括下屬以各區區長爲主任的十個發證所在內，除由我推薦的幾位燕大同學外，其餘都由胡夢華以兼處長身份安排任用。我雖提出新進人員由他主持面試，也只是走個過場。我身負業務全責，恐難控制，所以只有在制度上嚴加管理，堵塞漏洞，防止貪污舞弊，玷污處譽。

對此，我擬定的主要措施是：①、全部麵粉運存中央信託局倉庫，調配處只管發證提粉，不設倉庫，不留實物。②、全處一切款項只在中央銀行開立專户，各配售店售糧得款必須於次日送存中央銀行，然後將解款回執連同款額相等的證花貼單送處審核。如有留存挪用，立即取消配售資格。配售店手續費爲配麵收入的百分之五。③、調配處除少數備用金外不留現款，一切支出都由胡夢華或我簽出支票。除中央銀行外，款項不存其他任何銀行，以杜可能弊端。④、配購證以户爲單位，每户一份，載明人口總數，應配糧數等，每半年一發。每月

三花，分三期使用，購糧只限本段指定的幾家配售糧店，越段失效。這是爲了防止有人出售配購證，貪小失大。有事便於查考，保護市民利益。⑤、購糧不論多少，必須自備盛袋，拆袋稱斤，不准原袋出店。這是爲了防止印有美援字樣的面粉整袋在市間出現，造成投機搗賣不良影響，致使美方不滿。拆袋稱斤則可避免整袋尅斤等情事。⑥、每日派視察分赴各區巡查，如發現配售店有任何違章情況立即取消資格。本處人員有任何包庇勾结等情立即開除，不作記過、留用察看等處分。

天津配售自四月份開始，初時進展順利，後則糧源不繼，發生脫期現象。至天津解放時爲止，脫期先後共約兩個多月。但因糧價飛漲，配粉相對低廉，有時甚至低於玉米粉市價，所以無人放棄。這是因爲脫期補售仍照原價之故。例如九月份補售七月份配粉，其價格按照六月份平均零售粉價且略低核定，全月不變。時隔三月，粉價已相差很遠了。在當時家家户户的食用麵粉以此爲主，所以配糧之價格和供應之早遲最爲市民關心，各報記者幾乎每天來向我採訪詢問，爭相報道，我也因之名聲大著，成爲見報頻率最高的新聞人物。

杜建時和胡夢華由於政治背景不同，貌合神離。天津市每月配粉六十萬袋，收回價款爲數頗鉅，銀行存款僅次於中國纺織公司，位居天津第二。在杜建時任命我兼副處長之時，囑我謹慎小心，意在替他把關，牵制胡夢華，防止出現甚麼不光彩的事。調配處成立時，杜建時曾來對全處人員講話，强調年青人應當重名輕利，維護信譽，爲國增光，辦好全國初創的配售工作。當時，他年四十，我年廿八，而胡則年長，這些話具有針對性的深意。

胡夢華雖是處長，我以全權主持業務自居，遇事不免發生意見不合的磨擦，有時爭得面紅耳赤。我血氣方剛，往往堅持己見，直逼到胡夢華面帶慍色地不再開口爲止，而我自以爲勝利。其實他忍讓圓滑，我幼稚單純，他持此態度，可能是摸不清我所堅持的意見是我自己的，還是杜建時的。其後隨着配售工作日趨正常，胡、我之間的矛盾也逐漸緩和。配售有成績，他與有榮焉。

調配處工作瑣细繁忙，市府第三科任務更重，我身兼兩職，不肯服軟，只有中午不休息，趕往市府處理公文，有時還把文件帶回家在夜間辦，不使延誤。杜建時明知我累，卻也無法換人。並不是非我不可，除我無人，是因調配處名義上屬行政院，不在市府編制，而其地位與局相等，可以說是個臨時設立的局級業務機構，但隨時可以撤銷，科長才是本職。如果不在市府給我留個位置，一撤銷我就成了無本之木，與市府脱離了關係。

約在七月，市府參事出缺，我被升任參事。參事是與局長級別相同可以互調的在編實職，名額四人。主要是我自此可以參事身份出席市政會議，以前縱有事也只能列席。有了這個資歷，等於登上了青雲直上的階梯。

十一月，天津已是四面楚歌，日陷孤立。配粉運輸困難，不斷脱期。越脱期，市民企盼越加殷切，每天報紙多見我的允諾與解釋，往往口惠而實不至。幸而配粉價格極爲低廉，斷續供應，市民很能諒解。胡夢華於此時辭去處長兼職，並調回社會局在處兼任各组室主管的科長們，撂給我一個諸事待理的大攤子。我得以市府參事兼任處長，獨

撐艱局，喜憂兼半。喜得升職，憂在儕身高位，一旦城破，我必將成爲階囚。求官得官，前途莫卜。

可稱異數的是，在一九四八年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我連升三級，兩家報紙的標題是「孔令朋又升官」。我在科長任上的底薪是四百元，兼調配處副處長時升至四百八十元，參事升至五百六十元，處長則是六百元，享受簡任三級的待遇，僅次於市長、副市長。時年廿八歲，躊躇滿志，更復何求，得來不是自己掌握了機遇，而是純憑巧遇。

試想，如果不是得遇於杜建時，而他正少班底，給以青睞；如果不是適逢實行糧食配售的創舉；如果不是面臨解放，胡夢華見難而退；我縱空懷夢想，欲期一年三升也是不可能的。

民食配售事屬創舉，無章可循。五市各行其是，在美國人面前相互競爭，求得佳譽，避免成績不良致被取消資格。對五市每位市民來說，涉及切身利益，是件大受歡迎的新鮮事。我負業務全責，力戒瓜田李下，接事後就處心積慮，千思萬想，期能把天津的配政辦得既有成效又不出差錯，且須與衆不同，獨樹一幟。如此在各個環節上採取種種措施，便利市民，嚴防生弊，结果幸如預期。

天津配售先後不足一年，但也有數事可記。

⑴、經费充裕　高薪養廉

配售所需麵粉由中美雙方按月輪流供應，中方配粉售款全部收回再購備配粉，配售所需經費由美粉售款中提取百分之十，半作業務費用，半作行政開支，天津每月應配麵粉六十萬袋，就是每兩月從美粉

售款中提取相當六萬袋粉價的款項作爲經費，而且實報實銷，不受限制，所以經費充裕，可以高薪養廉。處裏人員的收入不止一倍地高於一般公教人員，另有一福利待遇。只有一條，嚴格要求按照規定辦事。事先說明出現任何旁門邪道有損處譽的行爲，不論輕重，一律開除，绝不姑息通融。因此，未曾發生在經濟上貪污舞弊致干紀律的事，也無人求去。

⑵、摻假風波

美粉來自剩餘物資，產地不同，牌號雜亂。個别牌號精白有餘，韌性不足。宜做饅頭，烙餅，不宜包餃子，抻麵條，容易露餡，拉斷。於是市間有了配粉摻白玉米粉的傳說，個别報紙且有報道。尤其天津商品檢驗局局長李爾康曾舉他家包餃子破皮爲例，在一次全市性會議上對此提出質疑，說要追查責任。當年糧食舞弊是最易使人相信的，何况更有事實爲據。

我考慮到口說無以服衆，爲了證清謠言，採取了兩個辦法。

一是請商檢局在任何一家或幾家配售店裏就出售的麵粉任意抽樣代驗，以證有無摻假。结果證無摻假，精度較高。

二是用正在配售的七種牌號的美粉，在同和居飯莊辦了一次别開生面的宴會，将各種牌號麵粉分别編號製成餃子、麵條、饅頭、烙餅四種不同的麵食，邀請中美有關部門的人員，尤其各新聞社，各報館的記者們到席。每桌擺出二十八種不同麵粉製成的不同麵食，請他們品嚐查驗。结果只有一三一種牌號麵粉包餃子有程度不同破皮現象；

抻麵條則咬勁不夠，有時抻不起來，出於韌性不足，而質量精細。所製其他麵食均好，色白鬆軟。有此一番比較，群疑盡釋。我在得意之餘隨口說了句：「外國人只會做麵包糕點，不會包餃子，抻麵條，所以這些麵粉最好用來蒸饅頭、烙餅。」不料，次日有家報紙登出了一篇報道，大字標題：「請君吃麵包，孔令朋如此說」。話之難講也如此。

⑶、配糧成績被譽五市之冠

是年初夏，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署長萊普漢來津視察，由杜建時陪同參觀調配處。我平時比較重視統計工作，繪有五顏六色的各式表格，有的且有中英文對照，此時向他出示，頗受讚許。我又詳細地解釋了天津配糧爲甚麼採取了一户一證，限段購買，拆袋稱斤等限制辦法的原因，强調了突出美援宣傳，防止弊端和維護市民利益。着重保證市面上絶無整袋美援麵粉出售。避免套購投機行爲。他聽後很感興趣，拍着我的肩頭表示滿意。

萊普漢又要參觀配售實況，問我去哪家配售店。我說：「配售店共有二百一十家，請隨便說個數字，說第幾號就去那一家。」我以此表示事先並無準備和充分自信，每家大小不同而執行規定則一。萊普漢隨即分赴各區參觀了幾家，驗證我所言爲實，當即向杜建時表示天津配售成績和辦法都比其他各市好。

事後得知萊普漢到南京見蔣介石時，盛讚天津配售成績爲五市之冠。蔣介石爲此嘉奬了杜建時，他和我都很得意，喜獲美蔣好評。我

更得意的是，我所想出來的那些與衆不同的限制辦法是取得優良成績的依靠，而當初是飽受其他各市批評的。

順便一提的一件事是我考慮到天津各大麵粉廠限於原料短缺，開工不足，幾至難以維持。於是建議由美方供應部份小麥在津加工，抵充麵粉，以規定出粉率外的節餘和麩皮作爲加工粉，既裕粉源，又節成本。經杜建時洽萊普漢獲得同意，隨即施行。這種加工生產的麵粉没有牌號，卻在袋皮上印有美援標記，替美國做了宣傳。

還有一點在此略作說明。當年美粉雖然來自美援，但配售目的在於緩和糧荒，保證供應。不論貧富老少一律享有同價購買的權利，只是收回價款用於救濟或建設，所以配售的本身性質不是救濟。救濟是間接的，款項來自市民的購款，不是美國的恩施。所以把配售粉看成救濟粉是一種不瞭解實情而致引起的誤解。有人如因不瞭解情況而拒絕購買，那是他的自由。

### ⑷、参議會上幾被引蛇出洞

勝利後，天津建立臨時參議會，幾經醞釀，才於一九四八年六月正式成立天津參議會，參議員一〇四人，派系複雜，紛爭不已。七月初召開第一次大會由市屬各局分別作了工作報告，並接受質詢，進展相當正常。民食調配處雖非市屬機構，既在天津，市民矚目，也應該報告處務。

事先我做了充分準備，自以爲我的工作深入人心，有持無恐，很想借此機會炫耀一番，出出風頭。没有想到會前梁子青告訴我，調配處的報告由胡夢華上台去做。我爲失此表現自己的機會甚感懊喪，不解其故。

開會那天，我坐在會場第一排，以備隨時可爲胡夢華提供信息，絲毫没有察覺風暴將至。

胡夢華剛一上台，未及開口，就有人喊：「你已經報告過了（指社會局），該換孔副處長上來啦。」我初聽此言還以爲是說者真想聽我報告，可見人心所向。跟着有人高喊：「調配處的事歸孔副處長管，還是讓他來吧。」「請孔副處長露露臉，和大家見見面」。甚至有人高叫：「請孔副處長上來，好不好哇！」，許多人答腔：「好！」我這才覺出味道不對，事有蹊蹺。如此喧嚷好幾分鐘，只見胡夢華站在台上，板着臉孔，吸煙不語。我年少氣盛，心中不服，很想上台替下胡夢華來，看看他們意欲何爲。然而，胡夢華始終站在那裏，毫無退讓之意。最後還是由議長楊亦周出來打圓場，說：「胡局長兼任調配處處長，應該由他報告。」這才勉强平息。

胡夢華報告方畢，開始質詢，又有人喊：「你說完了，該換孔副處長上來啦。」此時我真想上去和他們對陣，心中無鬼，能奈我何，可是胡夢華說：「我是處長，一切由我負責。」下面仍然有人繼續起哄。楊亦周再度出面說：「胡局長已經表示負責，如果有甚麼不清楚的地方，再請孔副處長補充。」這才不再嚷了。

所謂質詢實多故意挑釁，捕風捉影，言詞尖刻，例如：「美國來的是好麵，你們都給摻上了白棒子麵，倒底摻了多少？」「美國來的是大袋，調配處給換成小袋。這一折騰，孔副處長可老了鼻子啦？」「你們調配處的人爲甚麼掙的比別人多？」「你們調配處上班有車坐，人人發制服，哪裏來的這麼多錢？」等等。

此外還問一些並不重要的詳細業務數字，十分明顯是故意出難題，使你無法當場答覆。我事先安排在會場和處裏各有專人負責接打電話，各組室主任守在電話邊上準備隨時提供材料。所以質詢的數字很快傳到我手，然後遞交台上的胡夢華。對此又有人喊：「孔副處長別遞條了，還是你自己上來吧。」

對於前面的幾個問題，胡夢華根據事實做了答覆。調配處自己沒有倉庫，配粉全從中央信託局倉庫領取，配售店賣粉筆筆拆袋稱斤，不准連袋出售，市民購粉一斤都不會少，不存在大袋換小袋的「調包」問題。調配處是不屬市政府的獨立業務機構，經費來自美粉售款百分之五，多给工作人員一些待遇和福利是爲了使他們安心任職，不至出現損害市民利益的事。

出乎意外的是，有關摻假的質詢，未等胡夢華開口，坐在旁聽席上的商驗局局長李爾康突然起立發言。他說：「這件事是由我生疑引起的，我有責任替調配處證明。」接着講了調配處委託商檢局，商檢局又派人到配售店抽樣，所有樣品都是小麥，粉質良好，毫無摻假。他並爲 以前的不慎發言致起群疑，表示歉意。還有甚麼證明比這更有力呢。

在質詢過程中我憋了一肚子氣，既點了我的名，就想上去和他們來個以言還言，針鋒相對的辯論，覺得胡夢華的解釋態度軟弱。可是，胡夢華一撐到底，不讓我上。我納悶這是一齣甚麼戲。

事後，梁子青才告訴我，調配處的工作原來理所當然的由我報告，會前一天教育局局長郝任夫接到消息，由於國民黨市黨部和三青團與杜市長有矛盾，認爲我是杜建時的親信，想對我發難，打擊杜建時。我又有事得罪了三青團，很受忌恨。認爲我一定沉不住氣，只要在起哄時或答覆中出言不當或發火失態，他們就可以以藐視民意的罪名，指責控訴。輕則丟臉，重則撤職，遂其一石二鳥之計。不久前，北平市一位警察局局長即因此丟官。所以不得不臨陣換將。估計我如上台，定會鬧僵。如事先將原由告我，我必不服氣，只有把我悶在鼓裏。

我平時只想做好工作，爭取佳譽，卻差點成爲政治鬥爭，派系恩怨的犧牲品。我平時和胡夢華貌合神離，心存芥蒂，這次倒幫我硬頂，使我不落圈套。爲此，我向他表示謝意，他說：「闖蕩江湖幾十年，還能没有這點道行。我講的就是個義氣。」

我早知胡是當年國民黨外圍組織「誠社」的主要負責人。在燕京時我曾參加誠社，是一般成員，爲時較短，早已脱離，所以未曾對他提起。此時想及此事，告訴他我也是誠社一員。他聞之大感驚異，連說：「想不到你是自己人。」自此，我們的關係變得和諧正常，減少了對立的情緒。

官場磨擦，隨時可以發生。如果不是事先得到有人準備以我爲對象故意搗亂的消息，必是由我上台做工作報告，那些參議員哄鬧起來，

依我的性格，得理不肯讓人，不待忍無可忍早就不能容忍，出語必然尖刻挖苦，無異火上加油，正好中人下懷，還不定會在會場出現怎樣尷尬場面。闖過這一關，應也算是人生難遇。

㈤、未竟全功的全市人口卡

民食調配處的經費豐足充裕，我總想爲天津做點切實有益的事。配售既與每位市民的關係密切相連，我想到要爲一百八十萬市民建立一人一張的人口卡。分別載明姓名、性別、籍貫、年齡、職業、地址等。一式兩份，一存調配處，一存民政局。生死遷移，隨時更改抽換。我的設想是將來製成後在處裏設立查詢服務，想要知道任何人的地址等，可以提供資料。如此能對尋親訪友給以方便。政府没有這筆經費，調配處辦到了，在全國亦屬創舉。

我的計劃得到警察、民政兩局的積極支持，在每區發證所指定專人負責編製，招請社會人士填卡，給以相當報酬，論寫卡數量計值，要求字跡清晰，内容無誤，隨時抽查，定有罰則。工程浩大，耗時費事，但進行十分順利。我對此舉寄以厚望，頗感得意。可惜全功未盡，天津解放，當時已經製成大半，其後如何倒非我所知了。

## 天津解放前夕記事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妹令仁與由其文結婚於青島，我夫婦飛往祝賀。臨行前杜建時給了我一個任務，鑒於當時青島需要燃煤，天津需

要食油，囑我在青與市府洽商兩地實物交換，讓我探索對方意願，相機行事，隨時電報聯繫。此行因得公私兩便。

青島市市長龔學遂，秘書長徐燕謀都是父親老友，私交甚好。我平時以老伯相稱。我到青後因是天津特使所以兩人立來我家拜晤，禮遇頗隆。可是一談到煤油交換的問題，雙方發現各爲本身利益，意見相距至遠。首先是煤油需量很大，採購沒錢，只有以物易物，如何折價成了問題。雙方都主張按貨到對方的市價折對方當地的煤或油價。當然這是一廂情願，誰也不答應。我提出雙方都按貨到對方時的市價折算，即煤按青價。油按津價，津青都不同意。再加上煤和油的價縱能比，量則不成比例，運輸又成問題，對煤之去青，津青都要求對方派船，這又是無法談攏的事。實際上此議純爲空想，既使談成也難以實現，不過各自可以對市民交代已爲解救青之煤荒，津之油荒盡了努力。

談是談了三次，我未能完成這早就注定不能完成的使命。

## 妻兒離津的巧遇和驚險

一九四八年冬，東北解放，天津被圍，戰機四伏，危在旦夕。處在這種環境下,人人不能不爲自己的後路打算,可是我的出路何在呢?

十二月初，我已升任調配處處長，南京糧食部來電在上海召開糧食會議，涉及南糧北運，指定由我參加，梁子青也通知了我。不料，當時正在上海出差的財政局局長李金洲忽來電報，以他已在上海爲理

由，建議由他代我參加。杜建時問我的意見，我沒有想到去而不返，所以就說：「既然李局長已經提出來，就請他替我參加罷。」那知李金洲借此拖延返津時日，不久就於會後棄職去香港了。

實際上，我的妻子兒女在津，我不會置而不顧，即使我去了，也一定會回來，所以對此毫無遺憾。

時局日緊，杜建時爲了安撫人心，要求市府主要官員不要攜眷離津。暗中聽說有一張最後撤退的名單，約二十餘人，我在其內，必要時可有專機接離，像衛立煌等離瀋陽時那樣。

當時杜建時結婚未久，受軍統中傷，說他的夫人曾洛生是共産黨。曾洛生爲了避嫌，先期離津。杜無子女，孑然一身。屆時縱他能乘機離去，別人都有眷屬怎麼辦呢?

我的想法是職責在身，不得不勉力維持。我不可能獨自逃身留下妻兒不管，事實上此時交通幾斷，要走也走不了，所以決定留眷在津，與我共運。

每到關鍵時刻，總會有些特別的事發生在我身上。這次又是機生意外，柳暗花明。

調配處英文秘書全紹武，繼李大爲之後任外事處處長，平時在我處辦公。與我關係相處甚好。獨身在津，時常到我家午飯。十二月中旬末一晚，他忽來告我，受杜建時密命將於次晨飛青送信給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中將，要求美軍以保僑名義派陸戰隊來津協助防守，此議出自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民航不通，由空軍派有專機，如我的

妻兒要走可以隨往，但事先勿告杜建時。我獲此良機，大喜過望。我妻連夜安排，整治幾件行李，帶着一子一女，於次晨去張貴莊飛機場。到後知是將乘一架運輸機，場上擁擠了不少空軍眷屬也要搶乘此機。機師怕臨時失控，善意地請我的妻兒三人先進機艙，免生意外。這本是安全措施，絕對想不到的是在裝運武器上機時突然機槍走火。直射機艙，連續不下數十聲。全紹武和我見此情景，真嚇壞了。所幸機師趕快打開艙門，在看見我的妻兒步下舷梯時才放下心來。我妻在艙內，只見火光直冒，槍聲陣陣，不知出了甚麼事。好在她能臨事鎮靜，坐在前艙，槍擊後艙，卻也飽受虛驚。放在後艙的行李，多件冒煙，急忙取下，箱子和鋪蓋卷中彈穿洞，打開看時衣物洞穿處全被燒焦，其驚險危難可知。

經檢查，操縱線正巧打斷，無法修理。因有特殊任務，空軍改派一架轟炸機載走了全紹武和我的妻兒。凌空飛去，暗祝平安。當天下午，張貴莊飛機場就失守了。

我回到調配處，特意去和我的辦公室不在一樓的另一座樓裏的各組室巡察一遍，只見三五成群，議論紛紛，這是平時絕無的情象。大家看見我出現面前，多露驚奇之色。事後得知，由於我攜眷突去飛機場，都以爲我是棄職潛逃了，想不到我又回來。

當時津青電話仍通，通知我家去接，近午時有電話來告，知他們平安到達。我這才告訴杜建時，並爲 臨行匆促來不及向他請示，表示歉意。他當然也不好再說甚麼。

天津在幾被全部封鎖下，趕在跑馬場上建造了一個簡易飛機場，用鋼板鉚接鋪成跑道，可供小型飛機起降。全紹武就是在去青送信後先回北平，改乘小飛機回到天津。帶回白吉爾拒絕派兵馳援的回信。

這個臨時機場初時還能使用，例如運來中央銀行用以兑換黄金儲券的黄金。没有幾天，解放軍就把砲位校準跑道，一見飛機臨空，就砲打跑道，彈彈中的，迫使飛機無法降落。至此，機場全失效用。

在天津面臨解放的最後日子裏，市府各局主管除李金洲借代我開會爲 名趁機未返外，其餘各位局長及其眷屬全都留津未走。實際上，交通斷阻想走也難，僅我的妻兒得在最後一刻夤緣離津，真是事先夢想未及的巧事。

今天看來，離開天津無甚特殊，而在當時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如果全紹武不是我處秘書，和我關係至好；如果他受命之後不敢冒洩密之責連夜告我可帶我的妻兒飛青；如果他不是飛青送信而是飛往他地，或我没有家在青島；如果原訂飛青的專機中槍受損後，没有另一架轟炸機可以調用；如果機槍走火擊中的是前艙而非後艙；那麼即使有此千載離逢的機會，我的妻兒也走不了。説不定，全家留津的結果會改變我在解放後的命運。其非巧遇而何。

至於飛機停在跑道上被自己的機槍射穿機艙，那更是難得碰到的驚遇了。一天之內全讓我遇上了。

## 堅拒警備司令借糧的要求

一九四八年底，天津配粉雖已斷源，但包括應運北平因路斷未運的麵粉在內，庫存還有六十萬袋。這是我用來維持民食的僅有儲備。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看上了這批麵粉，先派其副官處長（忘其名）來，繼又親自邀我往談，提出向調配處借糧軍用。我釋以全部麵粉均歸行政院所有，我有權用以配售，無權出借。記得他說：「軍隊守城保民，軍食匱缺，無法作戰。請以大局爲 重。」我說：「民以食爲 天，老百姓没得吃，餓死了，軍隊保護誰呢！請以百姓爲 重。」前後商談數次，都是不歡而散。

最後一次是警備司令部來電話，說陳司令請我去談話，我對傳話人說：「我有事跑不開，歡迎陳司令來。」對方說：「軍事很緊，陳司令很忙，歉不能來。」我說：「供糧事忙，我也歉不能去。」放下電話不久，那位副官處長又來了，還是强調請我幫忙。我被逼無奈，想擺脱纠纏。想出三個辦不到的難題，請他任擇其一。它們是：①、請陳司令請示行政院，告以軍糧需用，下令讓我借糧。命令准借多少，我照發多少。②、由陳司令和我共同署名，向全市宣告配粉已由司令部徵用，暫停民食配售。③、中信局倉庫是存糧所在，僅有幾個警察看守，司令部派兵去搬，他們不敢攔阻。

當然，這是故意推脱。陳長捷無奈，再找杜建時請他跟我說。杜回答說：「配粉由孔處長全權處理，屬行政院管，我也無權允借。」此事不了了之。

我硬頂警備司令部的借糧，除要維持民食外，内心原因有二：一是軍事吃緊，天津難再有粉運來，只剩這麼點家底，借作軍糧，影響

配售，老百姓不答應。二是天津如果不守，我把民糧擅借軍用，這責任負不起。不能說沒有爲 自己打算的成份。

天津被圍，人心惶惶。調配處平日運糧都是租用卡車，此時卡車上街每被軍隊徵用，商家不敢出車。迫於無奈，我就僱用了幾十輛三輪車，十輛一組，每車七袋，分赴各區運粉。車前掛着調配處的小旗，穿梭街市，行人注目。在如此困難時期，千方百計維持配售，起了些安定民心的作用。

轉過年來，心知城破在即，事事勉爲 其難，頗有「知其不可爲 而爲 之」的感覺。不管怎樣，總算保全了那六十萬袋麵粉，完成了我的任務。

## 應付爭索「應變費」的鬧事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市府向中央銀行籌借了若干銀元，發給市屬機關人員每人三十塊大頭，作爲應變費，旨在安撫情緒。我替調配處同仁向杜建時要。他說：「你們不是市屬機關，平時待遇優厚，大家沒說甚麼。現在如果也和大家一樣發應變費，說不過去。」我想想是有道理，只好算了，準備向處裏同仁解釋，未慮有他。

不料，有位有中統背景的王××（姑隱其名），平時對我吹捧備至，是位拿錢不太辦事的專員，此時說我有錢不發，尅扣應變費，煽動鬧事，糾集少數幾個不明真相的同仁，來勢汹汹地到我辦公室來，强要發錢，甚至連杜建時安置的一位親信也在其內，揚言不給就打。

他們所持唯一理由是市府發了，我們也得發，大家全要應變。我說明已向杜市長提過要求，講清杜市長的意見，要想到我們平時所拿的待遇，比市府員工不知多多少倍於這筆應變費。如果說現在不公平，以前我們多拿是否公平。那兩個帶頭的依然吵嚷不休。我對那位杜建時的親信說：「你來得正好，請你去問問杜市長的意見。」爲 了緩和局面，我答應再找杜市長請示。

他們一走，我立去市府將情況向杜建時報告，他聽說那位親信也在其內很感意外，他說：「你處裏的人平時對你很好，何至如此。可能有共產黨操縱搗亂，你要好好地向他們解釋，說清道理，千萬別鬧出事來。」我看他無意給我應變銀元，用解我困，想是怕給了我，擺不平，引起別處又鬧。我很理解，只得算了，有事自己解決。

我從市府回家，立即通知下午召開全處大會，出於自信自傲的心理，特別囑咐把放在會場門口的講台搬到對面牆下，這樣我進門後必須穿過站立的人群，走向講台，相信我平日的威信足以壓勢。

中午，有兩位組長來我家勸告，最好不要開大會，改爲召集各組室主管開會，講明道理，由他們分別傳達，免生意外。我不同意，非試試功力不可。不信人人都是見利忘義，恩將仇報。

下午，我去會場，在樓梯上有任專員的燕大同學嚴德民等在那裏，提醒我注意，說：「王××說不答應給錢就要打你。務必當心一點。」事已至此，只有相信自己的人望了。

我一進會場，走向對面，人群主動閃出一條道路讓我過去。我站立台後，先不說話，掃視一遍，只見人人靜默，肅然無嘩，連王××也無動作，心中就有了底。我在講話中先感謝全體同仁和我共同努力，造福市民，取得一定成績，樹立社會信譽。現在正是考驗我們是不是愛護得來不易的成績和信譽的非常時刻。處裏有錢也要循章辦事。於是我問會計主任，這筆應變費有無專款，又問出納主任有無尅扣，所得答覆都是否定的。全體聽到，無話可說，卒得平安度過。事後，有位同學說：「你真是年輕膽大。」我說：「怕甚麼，理直才能膽大。」

其實，如果王××等真的動手，我也没有辦法。

## 天津解放初期的我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解放軍已於前一日發動總攻，杜建時明知大勢已去，卻仍故作鎮定，照常召開市政會議。只聞砲聲隆隆，槍聲陣陣。與會者都是局級人員，無不暗中擔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警察局副局長齊慶斌介紹了一些治安情況後，說：「不行了，人家要進來了。」大家靜默不語，忽聽樓下花園一聲巨響，警衛來報一發炮彈打中胡夢華的坐車。紧接着，市府大樓樓頂中彈，牆灰紛落，全樓震動，杜建時看見大家驚魂未定，只得宣佈散會。這是天津市政府最後一次的市政會議，直到三十二年後我才在北京重晤杜建時。

我到花園才知我的車停在胡夢華的車旁，幸未波及。回到調配處，還想安定下屬情緒，裝出泰然神態，到辦公大樓巡視一番，只見大家

早已無心工作，三五議論，見我進來才各返原位。此時方知剛才有一枚砲彈擊中院內文件倉庫，起火救熄，未遭損失。我仍然到辦公室去，還未坐下，司機崔學儒勸我回家。我考慮到我走了也好讓大家自由行動，不應再矜持那表面不怕的面子。

晚間，聽說解放軍已進市區，我打電話問梁子青。梁說：「金鋼橋已失，怕頂不住了。」我再打電話到訓練團找杜建時，由白副官接電話說：「市長已經休息。」我知他已不願再接電話，我請白副官轉告我曾打來電話。借以表示在最後時刻對他的關切。

這一夜在不斷砲聲中我睡得十分安穩，心情相當平靜，因爲我不知等待我的將是怎樣的命運，但我知道我自幼企望顯親揚名，出人頭地的夢想難再實現。一直青雲直上，引以自豪的官運，至此畫上了一個休止的句號。自己對自己無可再有作爲，只有聽天的命，心底反而坦然了。

## 在職移交 疑慮盡消

一月十五日晨，在我家門口響起槍聲，是解放軍肅清馬路。凌晨曾有幾個學兵敲門進入我家，崔學儒安排他們在書房集中，脫下軍服，以防誤會。聽見槍聲漸息，他就主動出去告訴解放軍家裏有準備受俘的學兵。跟着進來一位團長及政委和十幾位戰士。我向他們自報身份。他們說這事不歸他們管，他們是來借住幾天，我是房東。樓上留下我的卧室和另一間房给我用。正談話間有戰士面容嚴肅地進來報告，說發現車房裏有汽車，車上有特別通行證，認爲我可能是市長。那位政

委說我不是市長，那位戰士疑而退下。可能他來自農村，以爲只有市長大官方有汽車。

兩位軍官對我相當客氣。自我妻兒離津後我就邀友人林應復來家同住。晚間，他們要我倆陪打百分，（大陸的一種牌戲），我說不會，他說：「你樓下有那麼多付撲克牌，怎麼說不會打百分。」我解釋說撲克牌是打橋牌和沙蟹用的。他們說只知道撲克牌是打百分用。主動提出教我們打百分，對此友善態度，使我消除恐懼和戒備。他們又拿出在我書桌抽屜裏找到的天津城坊工事設計圖問我怎會有此機密文件，我告訴他們城防委員會的事，他們說如果早得此圖就太好了。

那一晚，林應復和我陪他們打了一晚百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打百分。

次晨，我懷着忐忑的心情去報到。臨行前將家事種種全都託付林應復，做好託妻寄子，一去不返的準備。

我先到市政府，接待登記的竟是宣傳科長陳嘉祥，他平時負責市政會議的記錄，想不到他是從事地下工作。我是參事，市長和秘書長已經被俘，此時應是市府裏報到的最高職位，以爲 一定會有麻煩，不料未作任何查問。

我再到調配處，外表上沒有任何變化，我照常到辦公室，工役唐舜功告訴我已將玻璃板下照片收起來，以防弄不清楚，並理好我的一些私人物件。我找來各组室負責人要求他們各盡其責，保全檔卷文件，作好移交準備。大家都表現得相當平靜。

不料，那位煽動應變費風波的王××忽來找我，說他另名王明，受命接收，這太意外了。由於他没有出示受命文件，我說只有接到正式命令才能移交。事後得知他是冒充的：

近中午時有位張同志持介紹信來晤，說是先來瞭解情況，今後有人正式接收。他告訴我近日來他和其他人不止一次地來處查看，也聯繫了幾位同仁，對我的情況十分清楚，（要完整移交，不必多慮。中午和我一起回家，查看家裏情況，找我的司機、廚師、聽差問話，知道我也是買配售麵粉吃，甚感驚訝。我告訴他家裏所有一切，除汽車外，無一公物；汽車立即交出，由他於飯後乘去。他囑我在家待命，在接到通知前不必去調配處。

約兩天後，通知我去處談話，到後方知調配處將由天津軍管會糧油部負責接收，有位李秘書先來聯繫，囑我做好一切準備，保全資料，等待何部長來後正式移交。全體職工先分组學習「新民主主義論」，我也在其中，讓我最好多談談心得。這是我初次得閱毛澤東著作，頗感新鮮，將其内容，畫成分析圖解，緊張的心情至此完全消除。

何部長（忘其名）來後初次見面十分和氣，言辭直爽。他告訴我，事先對我早有調查，糧食是重點，保全良好。目前我的任務是督促交代，此外一切自由，不受限制。知道我有胃病，不必和大家一起吃飯。可以外出就食，也可家裏送來。有甚麼問題或要求，只管提出，不必顧慮。如此優遇，實非始料所及。將做階下囚的疑慮，一掃而光。

這時，我的膽子大了起來，爲了表白自己，提出以下三點：①、除汽車外，如查出我家的房租水電等日用開支有用公款的，願作貪污

罪論。②、全處三百多人，不敢說一無問題，但组室主任以上人員有貪污舞弊者，一經查出，我負全責。③、天津一百八十萬市民人人都吃配粉，可在馬路上問任何一人，孔令朋是好官壞官。如有人說我是壞官，查出實據，甘當認罪。何部長聽後說：「你不講，我們也會調查。有則有，無則無，你可放心。」

我的移交工作主要是交出六十萬袋存粉和數額巨大的存款。其餘就是全部賬册、憑證和檔卷。還有每家配售店的存粉和表報證花點數核對等。由於麵粉全存中信局倉庫，除已發配售店者外别無一袋；錢全存中央銀行，除少數總務備用金外别無一元。所以簡明清楚，完整無失。我當初提出一不管糧，二不管錢原是爲了保護自己，卻在這時起了重要作用。

我交出的這些麵粉因不再供應配售，被分批拿到市場出售，對維持解放初期的民食大有裨益。

## 澄清誣告 幸早自律

我在交代期間行動自由，將近尾聲，李秘書忽然通知要我留住兩夜，一再聲明绝無他意，是因何部長白天事忙，便於晚間找我談話。

第一晚，何部長未來。第二晚，他來到我的住室，毫無拘束地談了很久，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談話的主要内容是：

①、他告訴我不但解放前已曾對我調查，接收後又向全處員工進行了深入瞭解。對我的一切更加清楚。一致的意見是說我辦事認真，勇於負責，只因年少氣盛，爭强好勝，往往自以爲是，易得罪人。衆口一詞保證我不貪污，好名輕利，認爲和我的家庭出身有關。

②、他說有人三番兩次地告你，主要問題有二：一是扣發應變費企圖自肥，二是不發錢卻匯滬巨款，準備逃走私吞。經查未發應變費是將這筆錢留給人民，做得很對。匯款去上海是根據上級命令購糧運津，有來往電報可憑。如要逃走，家眷離津時早可同行，何必等待。當時款已在滬。此外還有幾件小事，有的誣告，有的我做得正確，越查對你越清楚。我聞之心感，不問也知告我者必是王××。在談話中他沒有點名，曾說：「你年紀輕，分不清人的好壞，一視同仁。」

③、他問我知否屬下有多少國民黨員。我說從未過問，只知有個支部，估計有四五十人。他說：「你這個官是怎麼當的。連手下有多少黨員都不清楚。」我說：「這更說明我不是國民黨員。」他告訴我已經登記的有一百多人。此數之多實出意外，想乃人事由胡夢華掌握，他畢生從事國民黨黨務之故。

他又解釋留我住夜是爲此次談話，萬勿誤會。明日即可回家。

## 無官一身輕

說到家，自解放那一天起。我就與解放軍同住。首批官兵走後，住入一位四野師長，除警衛員外還有隨從數人，他住樓下客廳，我住

樓上，門外有人站崗，全樓夜不關燈，找我的人可以自由出入，不受限制。我不問也不知其姓名，雙方從未交談，偶然碰面，他必主動上前和我握手，不發一言。有一次，我的聽差告我，聽說他的外號是「猴子」我囑勿亂說。如此同住一月左右，臨行給我開了使用水電煤炭證明，我才知這是解放軍的紀律。

我的交代手續辦了一個多月，未出任何問題。结束之日，宣佈留用和離職人員的名單，各佔一半。離職後發給證書和路條，組室主任以上也有數人留用。對我則當衆說明，只因我是主管，依章不能留用，很感遺憾。我則十分慶幸，從此可獲自由。

我見別人都可離津，連我的四名秘書，其中三名國民黨員全可獲准繞道去待解放區。此時我的父母在青，妻兒還滬，故也提出去上海與家人團聚的要求。李秘書說一定會讓我回家，不過要等些時候，看看有無未了事宜。在等待期間不必再來，有事會找我。

那位師長搬走後，除林應復外另有四位朋友先後攜眷遷住我家。我還有廚師，聽差和一名女僕堅不肯走，情願不要工資，等我離津再去。我賣了跨斗三輛，室內鍋爐等維持他們的生活，所以我的食住家務有人照顧。

甚麼叫無官一身輕，此時深有體會。無煩無惱無憂無慮。我不管人，人不管我。和同住的朋友們一起談天說地，聽無線電，打橋牌，打麻將。真是自在消遙。唯一遺憾是不能回家團聚，幸津滬長途電話已通，可以互報平安。

北平和平解放，我和友人同去住了些時，遊山玩水，四處吃喝。大家湊錢，自得其樂。

解放前，我身在官場不能涉足營業舞場。一九四八年秋，東北敗兵湧入天津，經常鬧事，市府下令開閉有舞女的舞場，惹得經理、大班、樂師、舞女等派代表前來請願，由我接見安撫。解放後，舞場重開。有一次我和幾位朋友去湊熱鬧。只見生意興隆，座無隙地，正欲離去，忽有人來招呼，很客氣地在樂池旁待爲我們加了一張枱子，代叫飲料，我不知何故。他才自我介紹，說是姓王，天津舞場業理事長，曾爲請願事見過我，事雖未成，我今天能來光顧仍表歡迎。事甚小，頗有趣。

## 最後結論 放歸上海

五月廿五日上海解放，糧油部立即發給我離職書和路條，准我離津。這時我才明白，以前不放我走是爲了等待上海解放。

離津前夕，何部長找我去作了一次意義深長的談話。作爲臨別贈言。

他先問我今後的打算，說實在的，我心中無數，不知能幹甚麼。我以前從未想到從事商業，至此，只好答以想做生意。問：「做甚麼生意？」我說：「如果可能就幹進出口。」這確是真實思想，因見進出口行業轉手可博重利。但如何入手，心中無數。他說：「那很好，

上海一定會有機會。可是有一樣，你不能再給國民黨當官了。如果第二次被解放，就没有現在那麼簡單了。」我對此做了保證。

他問我對自己有何看法。我說：「畢而優則仕，顯親揚名，是我從小志願。你們没來之前，做官只有做國民黨的官。我該不該做官是一件事，但自認做官以來没有幹過壞事。」他一聽就笑了，說：「我第一次見你，你就提出三點保證，要我們調查，無非是想爲自己表功。我們如果不清楚也不會這樣待你。可是必須說明白，你那些保證不唯無功，而且有罪。因爲 你越做得好越是忠心耿耿地爲 國民黨賣力，你不會希望我們來。我們來了，你的官就做不成了。國民黨貪污腐敗，盡失民心，才會失敗得那麼快。你想想看，國民黨的官都像你那樣做，革命何時才能成功，所以說你有罪。不過，你確實没有殘害過老百姓，也辦了些有益他們的事。你堅決不借糧给陳長捷，不發不該發的應變費，把糧錢完整地留下來交给人民，這是立了功。所以才對你特别寬容，和對别人不一樣。」

他最後說：「經過這次的交代和對你的調查，我們對你的情况完全瞭解，今後爲你過去的事不會有人動你一根毫毛。有事，我們共產黨對你負責。」

這些話真是前所未聞，意料不到。功也罷，罪也罷，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過去的審慎，就没有今天的寬鬆。

事實證明，在以後的歲月裏，歷經各項運動，雖因時勢所趨，厄運連連，坎坷跌宕，但是與别人比較同中還有不同，绝處可以逢生。

我估計和我離津時的個人檔案結論有關。這些都是後話，詳見《我的厄運》章。

我於六月三日乘車離津，當時津浦線尚未直通，只能先到濟南，再轉蚌埠，南京，途行三日方抵上海。家人歡聚，恍如隔世。父母妻兒弟妹親友誰也未敢料想我竟如此瀟灑自如地平安歸來。此時此地世間還有甚麼事物比家更能慰我情懷呢。

勝利後，我爲接收去天津。“解放”後，我被接收離天津。將近四年的經歷頗多可記，因述是章。

